

試論梁佩蘭“自成面目” 詩論體系之價值及其與 嶺南文化傳統之關係*

董就雄

提 要

明末清初嶺南三大家之一梁佩蘭詩論最突出之處乃在於擺脫當時宗唐與宗宋之二元對立，提出“自成面目”之論。此詩論自成體系，經歷多年醞釀而成，是佩蘭詩學思想之核心。其論與創作實踐相結合，並體現在其一生創作之各個階段，在清初詩壇甚為少見。此論以“自成面目”說為總綱，下分“天地真聲”說、“殖學務本”說、“大筆大墨”說三主軸。其主張寫詩以自成面目為終極；首先須自道其真情；還須有先天後天之才，而先天不可強，故須殖學；才情兼備後，乃極其思以求化，寫出變化莫測之境界；最後以大筆大墨之題材範圍之。此詩論乃針對明代以來復古摹擬、幽深僻冷、淺率俚俗等詩風及流弊而發，其論首重性情之真，強調殖學，從學問中化出性情，先天後天之才並舉；客觀上正可去除公安派俚俗、過於率真之失，以及竟陵派幽僻之弊，同時有挽救復古派摹古而乏真情之病。佩蘭欲超脫宗唐宗宋之對立、調和各家之用意彰彰甚明。而此理論承繼唐順之“真精神”、公安派“真則我面不能同君面”之說以及錢謙益“學殖以深其根”的見解；並較好地吸取公安派重真之說，以殖學、溫厚去其淺

* 本論文為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轄下研究資助局(研資局,RGC)“自資學位界別競逐研究資助計劃”中“教員發展計劃(FDS)”《六瑩堂集校注及梁佩蘭與明末清初嶺南文化及歷史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項目批准號:UGC/FDS13/H04/15。本文之修改得益於匿名評審人提供之寶貴意見和建議,謹此說明,並致謝忱。

率俚俗。其同時又接續嶺南禪宗、心學、《易》學、文學等自成面目之學術文化傳統,尤其是上接嶺南文學傳統中多重革新之一面。其論儘管受前人論見及嶺南傳統影響,但在嶺南以至清初詩壇,正式將“自成面目”揭櫫成詩論,並形成完備體系,在多篇文章中發表,有“自成面目”之思維覺醒,且視之為嶺南獨異於中原之詩歌特色,則當以梁佩蘭為代表。

關鍵詞：梁佩蘭 嶺南三大家 自成面目 詩論 嶺南文化傳統

一、引言

梁佩蘭(1630—1705),字芝五,號藥亭、柴翁,晚號鬱州,廣東南海人。順治十四年(1657)鄉試第一,康熙二十七年(1688)登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是明末清初著名詩人,號稱“嶺南三大家”之一,著有《六瑩堂集》前後集共十七卷,詩文二千餘篇。《清史列傳》指出其為當時嶺南詩壇領袖:“是時嶺海文社數百人,推梁佩蘭執牛耳……”¹其詩亦受清初諸大家推崇,如王士禛云:“今盡讀柴翁詩……周環俯仰之間,目快心怡,觸處俱成異境。信乎山靈毓秀,文字傳神,未易易也。”²朱彝尊云:“藥亭之詩,其筆若游龍,其養如木雞,其才肆,其學富,其氣磅礴。若滄海溟漭中,巨者細者無一不具靈異之氣。”³嚴繩孫云:“藥亭詩如蒼松古梅,受日月之精華,歷雪霜之凝結,體堅氣厚,自然鐵幹虬鱗,橫斜聳立;即柔枝嫩萼,亦別具幽姿,絕非凡林可比。”⁴趙執信云:“藥翁詩情

1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冊18,卷71,《文苑傳二·韓海》,頁5836。

2 梁佩蘭著,筆者校注:《梁佩蘭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冊6,《評詞》,頁1997。

3 同上注。

4 同上注,頁1998。

至文至，得於性，成於學。其渾融葱蒨氣色，未易為俗輩望見。”⁵ 加上佩蘭曾在北京與朱彝尊、方中德等名家主持詩會，俱足證其超卓之詩歌成就。

在其詩歌成就背後，離不開創作理論之支持。佩蘭詩論最突出之處乃在於擺脫明末清初詩論宗唐與宗宋之二元對立，提出自成體系之“自成面目”詩論。其論有針對當日復古、公安、竟陵諸派理論之弊病，調和各家之用意和價值，且與嶺南文化傳統有相當關係。為驗證此等觀察，本文擬探析佩蘭“自成面目”詩論之內涵、提出此詩論之用心及在當時之價值，並析出此理論與嶺南地理位置及文化傳統之關連，廓清佩蘭詩論對嶺南文化傳統之通與變。

二、環環相扣的自成面目詩論

在探論佩蘭“自成面目”詩論內涵之前，有需要對其詩學思想的發展脈絡及詩風作一簡要勾勒。⁶ 一般認為，其詩學思想之發展可分為兩個階段。據張尚瑗（1656—?）《六瑩堂集序》云：“藥亭之為詩，名理於《莊》，旨趣於《騷》，而筋力於《選》，固不猶依傍宋唐門戶者。然其少作，間亦馳驟於十子、七子之間。晚年與新城、商丘諸先生游，則時時瓣香韓、蘇，示能兼長。”⁷ 張氏指出佩蘭在與王士禛（1634—1711）及宋荦（1634—1713）相交前，曾受明末清初婁東十子及明代前後七子影響，有推重唐詩及復古之取向。而佩蘭與士禛結交於康熙六年（1667），⁸ 則此前可視為第一階段。時佩蘭三十九歲，實際不算晚年，只能說是壯年。張氏謂佩蘭與士禛相交後，寫作韓愈（768—824）、蘇軾（1037—1101）兩種風格之詩，以顯示自己能兼唐宋。鄧之誠（1887—1960）《清詩紀事初編》亦稱佩蘭兼學唐詩及宋代蘇軾、陸游：“早歲之作，尚不脫七子窠臼。及

5 同上注，頁 2000。

6 蒙匿名評審人提醒，宜就佩蘭之詩學思想之脈絡作梳理，乃增入此部分。謹此對評審人之寶貴意見敬表謝意。

7 張尚瑗：《六瑩堂集序》，載梁佩蘭著，筆者校注：《梁佩蘭集校注》，冊 1，頁 4。

8 繫年據呂永光：《梁佩蘭年譜簡編》，載梁佩蘭撰，呂永光校點補輯：《六瑩堂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2 年），頁 466。

交王士禛、朱彝尊，始參以眉山、劍南。”⁹如此看來，佩蘭在結交士禛之後及至晚年，既宗唐，又參以宋詩，就是其詩學發展之第二個階段。

佩蘭老友王邦畿(1618—1668)之子王隼(1644—1700)為佩蘭《六瑩堂集》(初集)寫序時，卻提出另一種見解。此集刻成於康熙二十年(1681)，其時佩蘭赴京應考翌年之會試，遂刻成詩集以便攜京。王隼序云：“世之讀斯集者，或擬為天寶、大曆之音，余謂先生詩，決從漢魏入，不必借徑三唐。蓋取神於蘇、李、枚叔，取骨於三曹。或偶然涉筆，則又復驅駕康樂、宣城、青蓮、少陵諸子，蓋其大概云。”¹⁰王氏反對佩蘭詩師法三唐之說，主張其詩不是借徑三唐，而是直接從漢魏入；兼得蘇武、李陵詩與枚乘賦之神韻，復取三曹之風骨；有時亦見出謝靈運、謝朓、李杜等之風貌。這是總論佩蘭康熙二十年及以前之學詩取向，認為佩蘭詩是直接取法漢魏詩。

上述諸說，都只着眼於佩蘭詩學習或近似何家何派，其實佩蘭對漢魏、三唐以至宋詩都有取法，甚至是《莊子》、《楚辭》、《文選》(收錄周代至六朝梁以前之作品)都作鑽研。但他卻不以貌似其詩為終極，而是尋求寫出“自成面目”之詩。張尚瑗、鄧之誠、王隼所描述者，皆是佩蘭綜貫歷代詩之過程，是其《東軒詩略序》中“學問綜貫，上下古今”之理論實踐(下文將有詳論)。筆者以為，其詩學思想發展應分為前後兩期，以康熙二十年(時佩蘭五十三歲)其刻成《六瑩堂集》(初集)為分界線。前期是綜貫研磨歷代詩學以求自成面目之階段，故體現在詩作中就既有張尚瑗所說“名理於《莊》，旨趣於《騷》，而筋力於《選》”“間亦馳驟於十子、七子之間”及“瓣香韓、蘇”之狀態，亦有鄧之誠所言“參以眉山、劍南”的特點，復有王隼所說兼採漢魏南北朝以至唐詩之傾向；從陳恭尹、屈大均為其《六瑩堂集》(初集)所寫之序可知，佩蘭此時之自我面目已形成(詳下文)。

後期則大致可以定為五十三歲以後，是“自成面目”之完全發揮，從心所欲階段，以及此理論之總結階段。所以張尚瑗《六瑩堂集序》又云：

⁹ 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986。

¹⁰ 同上注。

今藥亭之詩，可以為唐之初盛，可以為中晚，可以為宋元，隨時遷改；而名理旨趣筋力之所在，要自有所為六瑩堂之詩。卓然成一家言者，藥亭之才也。¹¹

此序為佩蘭《六瑩堂集》(初集)補輯本及《六瑩堂集》(二集)合集而寫，時為康熙四十七年戊子(1708)，已是佩蘭卒後三年，¹²可以說是對佩蘭五十三歲以後至卒年期間詩學追求及詩風之總結。張氏稱佩蘭詩可以為唐之初盛中晚，又可以為宋元，呈露出“卓然成一家言”的“六瑩堂之詩”。加上佩蘭晚年期間發表多篇與“自成面目”詩論相關之文章，故此時亦可說是其理論之收成期。

總之，佩蘭“自成面目”之詩學思想早就形成，並綜貫其一生，這在時人論述其詩風時亦可以見出，如佩蘭老友方中德(1632—?)，號依巖)云：

藥亭敏性潛心，鎔異才於正矩之中。其詩凡數變：少年才思奇特，闢語驚人；一變而渾含包舉，意概恢宏；再變而骨淨神融，體舒氣靜；今則洗滌烹鍊，廣博澄涵，神骨聲色皆備之矣。先君向與陳卧子先生主壇坫，論詩之新緊刻動。比讀藥亭詩，於真實處見其新，於寬綽處見其緊，於平淡處見其刻，於安靜處見其動。真九轉之丹，可以療纖薄膚腐之疾。¹³

指出其詩風歷經四變：少年、青年、壯年、晚年¹⁴皆各有面目。他又以父親方以智論詩所重視之新、緊、刻、動四字描繪佩蘭總體詩風，認為其表達真情處見出新寫法，在寬裕佈局中展現出緊湊，在詞句平淡中體現詩意之深刻，在寫景安靜處能以動態作配合。方氏更指出佩蘭詩可解救時人纖巧、浮薄、膚陋、陳腐之

11 張尚瑗：《六瑩堂集序》，載梁佩蘭著，筆者校注：《梁佩蘭集校注》，冊1，頁4。

12 據呂永光：《梁佩蘭年譜簡編·後譜》“清康熙四十七年戊子(1708)”條云：“梁佩蘭門人故舊以《六瑩堂初集》收錄未盡，與其子梁僧述、梁沂補輯釐正付刻，合《六瑩堂二集》以行。張尚瑗為作序。”載梁佩蘭撰，呂永光校點補輯：《六瑩堂集》，頁483。

13 見《評詞》，梁佩蘭著，筆者校注：《梁佩蘭集校注》，冊6，頁1997。

14 方中德之評語出自《六瑩堂集》一二集合集之“評詞”，寫作年份與上引張序相若，即康熙四十七年(1708)，已是佩蘭去世後三年，故評語中的“今”是指佩蘭晚年。

弊。可以說,佩蘭為詩論詩早就以“自成面目”為志向,亦是其詩學思想之核心,並在人生各個階段中展現出來,這在清初詩壇相當鮮見。

(一) 自成面目說

現在,我們探討此說之內涵。“自成面目”之說是嶺南三大家的共同主張,最早見於文字是陳恭尹於康熙二十年冬為佩蘭所寫之《梁藥亭詩序》,¹⁵時佩蘭赴京應翌年會試,遂刊刻《六瑩堂集》(初集)攜京,集中便載有恭尹此序。其中有云:“吾與齒雁行者,梁子藥亭、屈子翁山,為能發摠性靈,自開面目。”¹⁶又云:“詩之真者,長篇短句,正鋒側筆,各具一面目,而作者之性情自見。”¹⁷同於此年為佩蘭赴京餞行的還有屈大均,他也為《六瑩堂集》(初集)寫序,序中同樣提到自成面目:

吾黨二三子,才高者莫若梁子藥亭。其詩雄奇光怪,能開鑿自成一川嶽,下筆風馳電激,倏忽千萬里,不見其起滅之跡。……今天下詩,皆有委而無源,才雖具而無道以為之本。無本,故其詩不能縱橫自得,蹈空獨行,稍擬議即成變化,以合於《風》、《雅》。其僅善者,吾所知秦有二人,魯一人,齊一人,吳、越三四人,吾粵則藥亭、元孝其傑出者矣。¹⁸

大均稱佩蘭詩“能開鑿自成一川嶽”,又主張為詩要“縱橫自得,蹈空獨行”,這都自成面目之意;並與恭尹一樣,將佩蘭、恭尹(實際上還包括大均自己)這嶺南三大家組合視為能自成面目之傑出代表。佩蘭寫於康熙三十八年(1699)冬至之《東軒詩略序》,¹⁹亦重申“自成面目”之論:“此豈屑為雷同之習耶?蓋嘗

15 此序末署云:“辛酉之冬,藥亭將北上,率率刻其詩數十篇以行。予及同人集送六瑩堂,縱論及此,因書其卷端。”可知序成於康熙二十年(1681)冬。見陳恭尹《梁藥亭詩序》,載氏撰,郭培忠校點:《獨漉堂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年),頁690—692。

16 同上注,頁691—692。

17 同上注,頁691。

18 屈大均:《翁山文外·六瑩堂詩集序》,歐初、王貴忱主編:《屈大均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冊3,頁61。

19 繫年見梁佩蘭著,筆者校注:《梁佩蘭集校注》,冊6,頁2080。

與獨漉、翁山論詩，謂吾粵人人自成面目，不在天下風氣之內。”²⁰佩蘭所言無疑是對恭尹、大均“自成面目”說之呼應，亦與二大家一樣視他們三人為粵詩人中自成面目之代表。佩蘭此序雖寫於晚年，但從其“蓋嘗與獨漉、翁山論詩，謂吾粵人人自成面目”之論詩回憶，與及其提法與屈、陳相近之情況可知，佩蘭當早在陳、屈二家為其《六瑩堂集》（初集）寫序時甚至更早就與二家討論過“自成面目”說，並有一致共識。

嶺南三大家雖然都主張“自成面目”，但旗幟鮮明地將之發展成完整詩論體系卻當以梁佩蘭為代表。佩蘭論詩，反對復古，講求自成面目，上及《東軒詩略序》一文就是集中闡述其“自成面目”詩論之最重要文章。此序乃為陳恭尹兒子陳勵（字士皆，號東軒）《東軒詩略》而寫，是佩蘭晚年之詩論總結。開首云：“詩之道大矣！從源溯流，先河後海；非學問綜貫，上下古今者，不能也。”²¹提出為詩重要條件之一是“學問綜貫”，也就是積學，其“先河後海”出自《禮記·學記》：“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²²本義指古代君主祭祀河川，都是先祭河後祭海，表示重視本源之意。佩蘭這是提出積學務本之說，認為寫詩須窮源溯流、先河後海，重視本源，這本源就是綜貫上下古今之學問，也就是積學。

佩蘭《東軒詩略序》進一步提出“自成面目”的要求：

夫人各具有胸中，其從事風雅，浸淫歲月，亦必有以自信而後發，而為詩確然可傳。此豈屑為雷同之習耶？蓋嘗與獨漉、翁山論詩，謂吾粵人人自成面目，不在天下風氣之內。誠以詩之高在標格，遠在神韻，精在骨髓。其或造徑之創，特辟鴻濛；煉句之巧，幾經淘汰。譬之黃金入火，白玉錯刀，雖則光怪百出，要皆有大筆大墨行於其間。非同摺摭幽僻，纂雜

20 梁佩蘭：《東軒詩略序》，載氏著，筆者校注：《梁佩蘭集校注》，冊6，頁2078—2079。

21 同上注，頁2078。

22 《禮記·學記》，見楊天宇撰：《禮記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冊下，頁466。

稗乘,便自以為排鼻妥貼、新奇可喜也。²³

其重點有四：其一，每人心中各有獨立的思想感情，在長期沉浸於研究詩歌及創作，形成自信之後，方發而為詩，這種詩就可以留傳。“人各具有胸中”指情，“從事風雅，浸淫歲月”指才，能這樣才情結合來寫詩的人，他自然不屑作雷同古人之詩。其二，他認為自己與恭尹、大均為代表的粵人詩都能“自成面目”，不在天下摹擬風氣之內。其三，粵人“自成面目”之詩的特點是格調高超、神韻悠遠、立意精深。其四，能寫出這種“自成面目”之詩，須做到獨創一路，不斷鍛煉詩句；而這種獨創之詩雖然光怪百出、變化多端，但所寫都要是“大筆大墨”，而不能以幽僻、低俗之內容字句為尚，尋求自以為是的豪宕與新奇。從其反對幽僻、低俗之提法可知，此“大筆大墨”實際上是說寫詩要合符溫柔敦厚之旨。約言之，若要“自開面目”，需要做到表達自己獨立的思想感情（真感情）與沉浸於詩（積學）相配的地步，亦即才情結合；並選取大筆大墨（溫柔敦厚）之內容字句為詩。

佩蘭並以陳恭尹及陳勵之詩作為“自開面目”說之代表作：

顧獨漉詩羅籠萬態，而細入毫芒。每一涉筆，山嶽不移，招搖四照。然以沖和涵澹寫其磊落不平之氣，時或有之。士皆則如崇蘭在谷，令人聞而知其香。更流連景物，善摭雅懷，皓月冰池，玄雲朱閣。說者謂其託體義山，而不知其得力徐、庾。至於排律，動輒千言，變化無垠，藍朱成采。自有唐杜少陵而外，所僅見也。昔梁武帝評王右軍書為龍跳天門，虎卧鳳閣；而於子敬，則以河朔少年，充悅舉體擬之。夫士皆視其尊人之詩，自成面目，亦如是而已矣。²⁴

認為恭尹詩包羅萬態，形容極其細致，每當定好詩意，一動筆便一往無前，山嶽

²³ 梁佩蘭：《東軒詩略序》，載氏著，筆者校注：《梁佩蘭集校注》，冊6，頁2078—2079。

²⁴ 同上注，頁2079。

倒於前而不改，又如北斗第七星搖光星般光輝四射。但也常常以淡泊平和、激蕩如波之筆以寫其磊落不平之氣。相較之下，陳勵詩則寫得比較穠麗，如幽谷中之叢蘭，工於描繪景物，得力於南北朝時期徐陵、庾信等人之宮體詩。而他的排律則動輒百韻，變化多端，穠麗多彩，為杜甫外所僅見。佩蘭並用舊傳梁武帝蕭衍《評書》中評王羲之書法為“龍跳天門，虎卧鳳閣”、其子王獻之書法為“河朔少年，充悅舉體”（謂舉止欣喜自得）之評語，²⁵以比擬陳恭尹及陳勵父子之詩風各有面目。

由上面分析可知，《東軒詩略序》實是一篇楊槩和闡述佩蘭“自成面目”說詩論之完整文章。其說自成體系，以“自成面目”為詩論總綱，以積學務本、抒寫真情、大筆大墨（溫柔敦厚）三項要求為條件，這可以說是總綱下的三條主軸。而且佩蘭自成面目、積學務本、抒寫真情、大筆大墨諸說在他的其他文章中都有呼應及進一步論述，茲一一析論如下：

上文已提到，佩蘭當早在康熙二十年（1681）冬陳、屈二家為他詩集寫序時便與二家討論過“自成面目”之論見，並與他們一致認為嶺南三大詩人是嶺南詩人中“自成面目”之代表。而佩蘭將此見化為文字，則要到康熙三十二年（1693）²⁶為同鄉吳文煒（1637—1696）（字山帶）《金茆山堂集》寫序時，其中有云：“今海內之詩，競趨習尚。予粵處中原甌脫，人各自立，抒其性情，翁山、元孝而外，山帶其一也。適《金茆山堂詩》刻成，有事於北征，予故序其端如此。此予嶺南山帶之詩也，以為海內今日之詩，可也。”²⁷指出廣東位處於中原之邊境，故粵詩能不受當時海內擬古習尚之影響，而“人各自立”，自成面目。並稱大均、恭尹及吳文煒都是粵詩自成面目之代表，且謂吳氏之詩才是海內當時應有之詩。言下之意是否定復古派之摹擬，以為這樣欠缺個人面目。這實質是佩

25 舊傳蕭衍《評書》云：“王羲之書字勢雄逸，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閣，故歷代寶之，永以為訓。……王獻之書絕眾超群，無人可擬，如河朔少年，皆悉充悅，舉體沓拖而不可耐。”載陳思編撰，崔爾平校注：《書苑菁華校注》（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年），頁26。《評書》一題作《古今書人優劣評》，見上海書畫出版社、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室編：《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年），頁81。

26 呂永光：《梁佩蘭佚文輯目提要》云：“此文作於康熙三十二年。”載《廣東史志》1989年第3期（總第21期），頁50。

27 梁佩蘭：《金茆山堂集序》，載氏著，筆者校注：《梁佩蘭集校注》，冊6，頁2064。

蘭《東軒詩略序》中“蓋嘗與獨漉、翁山論詩，謂吾粵人人自成面目，不在天下風氣之內”論調之重申及呼應，可見他對自成面目說有堅實的信念。佩蘭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寫的《蘭湖詩選序》也以能否自成一家(面目)為判別詩歌水平高下之標準：

公為人孤介絕俗……詩精銳入冥，天骨自張，姿態呈露，殆山林詩之雄傑也。昔有唐高僧詩推杼山、禪月、白蓮。予閱其全集，惟杼山詩清澈宏遠，類有道者所為，能自成一家言耳。禪月自選家所錄而外，俱粗俗不堪；白蓮咄咄能新，而間以用意太過，以傷氣骨，俱不能與公比量。假使□在今日，²⁸正不知殊(疑作珠)槃玉敦，誰當拱手而讓也。²⁹

《蘭湖詩選》是廣州法性寺僧釋願光(字心月，號心公)的詩集。佩蘭稱其詩是山林類詩中之雄傑，並以唐代三位詩僧皎然《杼山集》、貫休《禪月集》及齊己《白蓮集》作比，認為只有皎然詩能自成一家；貫休及齊己俱不能與願光比較。換言之，他認為願光詩也能自成面目，並以精力銳氣高入雲霄，風骨張舉、姿態顯露一類之雄健詩風為其面目之特色。可知“自成面目”之見解，佩蘭應該早在康熙二十年時便與陳、屈共同討論，其後在《金茆山堂集》、《蘭湖詩選序》等不同文章中再次強調，最終在《東軒詩略序》中作為其“自成面目”詩論體系之總綱提出。

(二) 殖學務本說

上文論及，佩蘭《東軒詩略序》開門見山即提出積學務本之見，視之為“自成面目”的先決條件。積學這個概念，在佩蘭詩論中更常以“殖學”或“學殖”標示，他早在康熙十二年(1673)前後，³⁰便在《大樗堂初集序》一文提到：

28 此句原有缺字。

29 梁佩蘭：《蘭湖詩選序》，載氏著，筆者校注：《梁佩蘭集校注》，冊6，頁2067。

30 呂永光：《梁佩蘭佚文輯目提要》云：“此文作於康熙十二年前後。”載《廣東史志》，頁50。

末世崇飾虛名，人鮮殖學。甫就摺摭，便爾揚詡。毋論其於三百五篇比、興、賦之義未識源流，即漢、魏、六朝、三唐以迄有明，亦未能望其牆仞。而乃立壁分門，各自排詆。此如五尺童子，誇其勇健，徒手而入疆圉，非有妘胡之筈、桃弧之矢，可恃以應人之敵也。不過一農夫，操隴畝耒耜之器，羸行而隨其後，已魄喪仆地矣。如此而言詩，詩安得不亡？³¹

引文寓意是：不殖學者相當於自誇勇敢強健，而沒有良弓、利箭裝備下空手入邊境殺敵的五尺童子；那些追隨者就如同只操持耕具而赤身露體緊隨童子之後的農夫；殖學就相當於訓練有素的健將配上良弓利箭；自然高下立見。佩蘭甚至認為詩亡於不殖學，因為這等於上述沒有接受訓練且無裝備的童子及農夫，一赴疆場，自然必死無疑。

佩蘭《楊大山文集序》亦云：

若夫文人學士，以著述為事，則必其平時學殖，搜羅百家，牢籠萬有，縱觀古今之大，細察品物之盛。見夫山川之流峙，草木之動植，鳥獸蟲魚之飛走咬啄，更通乎天人消息之微，陰陽動靜之機，造化往來之數，鬼神屈伸之狀。悠然暢然於中，而有以得其所為文也者。³²

此序寫於康熙三十一年（1692），³³楊大山即楊鍾嶽，廣東澄海人，康熙三年進士，十八年任福建學政。佩蘭在序中提出平時須學殖（即殖學），具體方法是搜羅百家之學，掌握萬事萬物特點，縱觀古今學問之大、辨察物類之盛。多識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以得江山之助，通察天人盛衰變化的精微之道、陰陽動靜之先機、自然反覆之理、天地間精氣的聚散變化之狀。凡此種種，達至閒適而不促迫，暢然通曉於心胸之中之後，就可以寫出好文章。這雖是為文而發，亦通於詩；而且與《東軒詩略序》所言之“學問綜貫，上下古今”之積學務本要求相

31 梁佩蘭：《大樗堂初集序》，載氏著，筆者校注：《梁佩蘭集校注》，冊6，頁2055。

32 梁佩蘭：《楊大山文集序》，載氏著，筆者校注：《梁佩蘭集校注》，冊6，頁2059。

33 繫年見同上注，頁2059—2060。

一致。

如《東軒詩略序》中所表達之意，積學(即殖學)是自成面目之先決條件，佩蘭在為何栻《南塘漁父詩鈔》寫的序云：“士夫生鍾嶽瀆之秀，飽讀古今之書，含英咀華，發為文章，必思有以自見。”³⁴“飽讀古今之書，含英咀華”指的就是殖學，“發為文章，必思有以自見”就是自成面目，二者密切相連。

(三) 天地真聲說

抒寫真情是佩蘭“自成面目”說之第二主軸。他認為殖學務本之外，必須配合真情，使才情結合，才能寫出自成面目之作。其寫於康熙三十二年(1693)³⁵之《金茆山堂集序》即集中論述情真：“或謂：詩論時代，自《三百篇》，迨漢、魏、唐、宋、元、明，以至今日，氣運升降，體格因之；不綜貫，無以為詩。其論是也。不得其真而徒事雕繪，猶之乎狐貉其外，而敗絮其內耳。”³⁶他同意學詩須總括貫通歷代詩之說，這相當於佩蘭詩論總綱文章《東軒詩略序》中“學問綜貫，上下古今”的殖學務本之見，故佩蘭說“其論是也”。他進一步提出“真”的要求，以為缺乏真情而以所積學問雕繪文辭的話，等於狐貉皮袍在外，敗絮其中。

此序開首本就開宗明義道出“天地真聲”之說：

詩以自道其情而已矣。情之所至，一倡三嘆而已矣。物莫不因乎其所觸。觸之於目，接之於耳，貫之於心，而其人其地其事當乎吾前。吾從而往復週環，密視精審，而有以得其所以然之故。性情勃然而興，躍焉而出，激發焉而不能自禁。故夫天地、日月、風雨、露雷、山川、草木、動植，鳥獸飛走、魚龍變化，無一而非吾性情之物。而吾之喜怒哀樂，或則言笑，或則歌舞，或則感慨，或則幽咽，一一見於諷詠之間，而詩成焉。此天

34 梁佩蘭：《南塘漁父詩鈔序》，載同上注，頁 2085。

35 呂永光《梁佩蘭佚文輯目提要》對《金茆山堂集序》一文繫年云：“此文作於康熙三十二年。”載《廣東史志》，頁 50。

36 梁佩蘭：《金茆山堂集序》，載氏著，筆者校注：《梁佩蘭集校注》，冊 6，頁 2064。

地之真聲也。³⁷

此段有三個重點：其一，詩人寫詩是自道個人情感；其最高境界可令人一唱三嘆。其二，情感的產生源自人對事物的接觸，當人藉眼、耳、心接觸事物；接著仔細思量其中原委，即會有所感悟，諸種情感即會一發不可自禁；所以自然界天地萬物都是詩人筆下表達性情之物。其三，天下間客觀的人、地、事物等令人興發諸種情感，詩人將這些情感反映在詩中即是自道其情，是“天地之真聲”。佩蘭接着說：

團土而爲人，飾玄黃朱綠於其衣裳巾烏，以求其似，非不偉然人也；然擊之則碎，濡之則化。刻木爲偶，撫其頤則歌應節，拊其手則舞合度，此技之神也；然亦膠漆繚紹固結，稍戾其機而散。故夫情之不真，非詩也，團土刻木而已矣。³⁸

在他看來，捏土成泥人，裝飾之以人的衣冠；雖然偉岸，卻擊之即碎，濕之即化。而刻木製偶，以絲線操控之，雖能隨歌聲起舞，但也是由膠漆纏繞黏合而成，稍爲扭轉其機關向相反方向即會散斷。此等似人之物，縱得其似，終不過泥人木偶，絕非有血有肉之人。若果寫詩不由真情，就如此等泥人木偶無異。

佩蘭在《金茆山堂集序》又云：

又謂：詩有新故，某者爲新，某者爲故。夫自有天地而成古今，古今遞嬗，而天地常存，其故者也。乃人物醞釀其中，受其鴻蒙之氣以爲圓轉，日新而不窮者何也？忠孝節烈，生人應有之事，世所罕見，則皆以爲奇。男女、日用、飲食、布帛、菽粟，則庸視之，而竟不能自離於庸之內。夫性情，無所謂庸與奇也。詩亦如是而已矣。³⁹

37 同上注，頁 2063。

38 同上注。

39 同上注，頁 2063—2064。

對於別人提及詩有新舊,佩蘭反對此說,指出天地留存後世,是舊;但人物孕育於其中,卻能日新而不窮,原因就是人類有情。忠孝節烈本是人生應有之事,世所罕見,被視為奇;男女、日用等事,人所難離,被視為庸。但其實這都出自性情之真,無所謂庸與奇,故寫詩只要是情真即屬佳品,不能以庸或奇論性情。佩蘭這裏是強調今古恒久不變者是人的真情,主張情感無新舊、無庸奇,只有真或不真。換言之,他認為古今好詩的最重要共通點就是“情真”。

詩人之作能情真而為,則作品自然勝於虛擬矯情之篇,這其實涉及人品的層次。故佩蘭在此基礎上,提出詩如其人之見解,講求人品與詩品的統一,其《南塘漁父詩鈔序》云:

……又不如即現前之景物,寫逸士之幽懷。蟲魚草木,靜觀焉而得其消息之機;世故物情,冷覷焉而窮其變幻之態。任意揮斥,只自怡悅,不求人知。與乎於耕、於釣、於酒、於狂者,同一用意。若是者,謂之詩隱。南塘漁父,其隱於詩者乎。蓋漁父之為人,望之若癡、即之若愚;徐而察之,而後知其精神所寄,志慮所縈,非詩莫屬。方其瘁心與力,以為之鈞深索隱,鑿險錘幽,矻矻孳孳,常若不及;又安知塵世裏有所謂榮辱,有所謂顯晦,復有所謂壯老生死者哉!是故讀漁父詩,謂其能作如是人,乃能作如是詩,是未足以深知漁父者也;謂其能作如是詩,乃能作如是人,則知漁父,並知漁父之詩矣。⁴⁰

以為何栻(南塘漁父)之為人一如其詩:其為人如癡似愚,全副精神沉浸於詩,對詩鈞深索隱,勤勉以窮年地創作,對世事榮辱顯晦、壯老生死毫不在意。由於這種為人個性,故其詩亦不會與榮辱顯晦、壯老生死相關,而是流連風雅,寫其隱居生活中的逸士幽懷、自然景物變化的感悟,以及耕、釣生活等。其人其詩,達到高度統一,可以說是佩蘭所謂的“天地之真聲”。佩蘭又在寫給謝元汴(字梁也,號霜崖,廣東澄海人)的《與謝霜崖書》中云:

40 梁佩蘭:《南塘漁父詩鈔序》,載同上注,頁2085。

先生之文，大率如先生之人。先生自言其文三變，其人亦三變，是已。……詩原於《離騷》、《九章》、《天問》等篇；而盧仝之怪，長吉之鬼，孟郊之瘦，賈島之寒，元次山之樸，爐錘而出之；故又獨成其為先生之詩。執先生所為近文、古文、歌詩以壽世，真是與白日同不落也。⁴¹

佩蘭讚賞謝元汴其人如其文，又謂其詩源於《楚辭》，兼集盧仝之險怪、李賀之鬼幻、孟郊之瘦硬、賈島之寒峭、元結之古樸之長，而獨成一家之詩。在佩蘭看來，謝氏之作可以說做到文品、詩品與人品的統一；並自成面目。可見，要求寫詩能與人品統一，也是情真的一種反映；而只要能情真，在學習和沉浸諸家之詩後，就能以真情寫出自成面目之詩。這亦是佩蘭《東軒詩略序》中“夫人各具有胸中，其從事風雅，浸淫歲月，亦必有以自信而後發，而為詩確然可傳”一句的注脚。

真情在詩歌中要表達得好，還需要極其思以提煉情思，力臻化境，佩蘭在《大樗堂初集序》中云：

且夫詩者，思也。人情有所感於中，而不能散，則結而為思，而詩名焉。仲尼刪《詩》，列之於經，而以一言蔽之曰：“思無邪。”以此故，思之之力可以無所不至：灝博之而天地，杳渺之而鬼神，窈窕之而山川，虧蔽之而草木，歧喙之而鳥獸，蠕沫之而蟲魚，黜黯之而荒隧幽宮，光怪之而貝闕鮫室，緯繡之而羽翟黼黻，奇險之而蠶叢金牛，熬燥之而火井，膈膊之而冰車，剗刻之而石鼓；噉而濕，笑而啞，驚而呿，逆而爭，悲而齎，咨涕夷樂而飲食歌舞。嗚呼！神已而未已也！以水照水，猶以為擬淡也；以月配月，猶以為喻明也；以雪覆雪，猶以為比潔也；以竅接竅，猶以為存聽也。無色之色，無味之味，無聲之聲，此之謂化。王子蒲衣所著詩，神明造姿，孤雋表骨，學問醞釀，能極其思，左右變化以出之。⁴²

41 梁佩蘭：《與謝霜崖書》，載同上注，頁 2116—2117。

42 梁佩蘭：《大樗堂初集序》，載同上注，頁 2055—2056。

佩蘭指出人之情感產生於胸中，即結為“思”，“思之之力”相當於情思的想象力，可以想象到廣博的天地、幽渺的精靈、深遠的山川、枯蔽的草木、鳥獸的爬行與呼吸、蟲魚的行動與吐沫、荒隧幽宮的黑暗、龍宮水府的光怪、山雉羽毛所製舞具及舞服上花紋的乖戾搭配、蜀道南棧金牛峽的奇險、鹽井的乾燥、車走冰路時的起伏聲響、石鼓文文字的峭拔等境物。情思的想象力可及於噴嚏濕鼻、啞然失笑、驚奇錯愕、衝突相爭、抱志難用而生悲、因為嗟嘆或安樂而以飲食歌舞作抒發等情狀。而情思想象力之最高境界，可使作品達至“無色之色”“無味之味”“無聲之聲”，相當於老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⁴³的自然化境；這是發揮情思想象力到極致而入於化境的表現。

從佩蘭稱許王隼“王子蒲衣所著詩，神明造姿，孤雋表骨，學問醞釀，能極其思，左右變化以出之”之句可知，達至上述化境的前提條件是“學問醞釀”，即殖學務本；然後“極其思”，發揮最高的情思想象力，將真情提煉到極致的境界，尋求各方面變化而為詩。因此，寫出自開面目之詩首先要有學問累積，以學問承托情思，進而極情思想象之能，達至化境；這可以說是才情結合之最佳表現。前文《東軒詩略序》中“人各具有胸中，其從事風雅，浸淫歲月”數句所述才情結合之觀點，正與這裏《大樗堂初集序》所論內涵相合，可見佩蘭詩論之一致性。

(四) 大筆大墨說

前文已及，佩蘭在《東軒詩略序》提出“大筆大墨”之說，是“自成面目”說之第三主軸：“要皆有大筆大墨行於其間。非同摺摭幽僻，纂雜稗乘，便自以為排募妥貼，新奇可喜也。”⁴⁴“大筆大墨”實際是指向溫柔敦厚之內容及文字追求，此從“摺摭幽僻”（幽僻）、“纂雜稗乘”（低俗）二者與“大筆大墨”對舉可知；這是佩蘭自成面目詩論中對詩歌內容提出的一項重要條件。佩蘭在《大樗堂初集序》論極思入化之說時，便以溫柔敦厚為前提：“且夫詩者，思也。人情有

43 出自《老子》第四十一章，原文云：“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火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載王雲五主編，陳鼓應注譯：《老子今注今譯及評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頁204—205。

44 梁佩蘭：《東軒詩略序》，載氏著，筆者校注：《梁佩蘭集校注》，冊6，頁2079。

所感於中，而不能散，則結而為思，而詩名焉。仲尼刪《詩》，列之於經，而以一言蔽之曰：‘思無邪。’以此故，思之之力可以無所不至……”⁴⁵其意謂無論如何發揮想象力，並做到極思入化的地步，詩人之情思首先要符合“思無邪”之旨。“思無邪”可說是“溫柔敦厚”的最高原則，只要能“思無邪”，則無論正風正雅或變風變雅之作，都符合溫柔敦厚之旨。故佩蘭評論王隼詩云：

……然則蒲衣遇非其時，不得以忠厚和平之音，列清廟明堂、正風正雅三頌之什；猶庶幾於《匪風》、《下泉》、《繁霜》、《楚茨》、《板》、《蕩》，變風變雅之遺也。古天子以詩教化天下之意，仲尼刪《詩》、無邪之旨，不賴蒲衣而存哉？桓譚知其必傳，而不學者訾為覆瓿，且聽之矣。⁴⁶

認為王隼懷才不遇，不能以忠厚和平之音而為正風正雅之詩，但其作品亦屬於變風變雅之詩，故古天子以詩教化天下之意、孔子刪《詩》以及“思無邪”之為詩宗旨，都能賴王隼而存。佩蘭並以東漢桓譚評論揚雄《太玄經》必傳於後世，而劉歆譏為以之覆醬瓿為喻，稱王隼之詩必傳後世無疑。

對於溫柔敦厚之具體內涵，佩蘭在《書超玉軒詩集後》嘗有詳論：

凡詩人之性情在溫柔，詩人立言之旨在敦厚。世徒見夫《三百篇》所載《株林》、《桑中》、《候人》、《蜉蝣》、《苕華》、《大東》、《小旻》、《板》、《蕩》諸詩，以為詩人明刺淫奔、明刺小人、明刺饑饉與喪亂，有不必全用乎厚之之意；而不知當日詩人所見，始於千百中而後發嘆一、二焉，其立意固已厚矣。⁴⁷

主張詩人之性情（思想感情）講求溫和，立言之旨（詩歌的立意）講求寬厚。他並以《詩經》變風變雅、明顯諷刺之詩篇為例，指出世人認為這些作品有未必

45 梁佩蘭：《大樗堂初集序》，載同上注，頁 2055—2056。

46 同上注。

47 梁佩蘭：《書超玉軒詩集後》，載同上注，頁 2131。

全合符敦厚的地方是看得不通透,其實當時詩人所見淫奔、小人爲禍、饑饉、喪亂之亂象極多,詩人於千百種亂象中只選取其中一二寫詩作諷喻,其立意已甚爲寬厚。換言之,變風變雅之詩亦符合溫柔敦厚之旨。佩蘭進而以《超玉軒詩集》的作者姚彥昭之作品爲例對其說作佐證云:“姚子彥昭……伸紙動墨,莫不扣鉢而成,叉手立辦。備漢魏渾融之氣,掃齊梁旖旎之詞,深四唐精嚴之律,刺而不覺,美而不過,歌詠而不傷。於孔子所云溫柔敦厚之旨,殆有合焉。”⁴⁸以爲姚氏之作得漢魏之渾融、無齊梁之綺靡、得唐詩格律之精嚴;並能做到諷刺而不覺、稱美而不過當、詠歌而不過於傷感,故合符孔子溫柔敦厚之詩教。

在佩蘭看來,溫柔敦厚是詩人性情表達的終極要求,其爲陳子升(1614—1692,字喬生,號中洲,南海人)編遺集時所寫之《中洲草堂遺集序》云:

風雅之道,至今日發明無遺蘊矣。返觀明代前輩,優孟漢唐之衣冠,而性情不屬。闢吾粵之蠶叢者,人皆知功在羅季作、鄺湛若、陳中洲、王說作諸公。……雖然,才不可不奇,調不可不高也。有時空諸所有,有時實諸所無;有時高唱入雲,有時舟迴蕩漾;有時天然頽放,有時簇錦攢花;間或嗜險驅奇,畢竟雅人深致。總於溫厚和平,意旨不爽毫芒。是之謂中洲先生之詩云爾。⁴⁹

此序寫於康熙三十一年(1692)或稍後。開首批評明代前後七子復古派之摹擬行徑,認爲他們性情不真。並稱羅賓王(字季作,番禺人)、鄺露(1604—1650,字湛若,南海人)、陳子升、王邦畿(1618—1668,字說作,番禺人)諸人是“闢吾粵之蠶叢者”,一方面是指他們能開粵詩風氣,同時亦蘊含他們之詩能自成面目之意。佩蘭又以爲陳子升有奇才、其詩格調高。又能使實境虛、虛境實,其詩呈悠閒、頽放、艷麗、追險探奇之格;但終歸於溫厚和平,意旨毫不偏差。此提法正與《東軒詩略序》所云:

48 同上注,頁2131—2132。

49 梁佩蘭:《中洲草堂遺集序》,載同上注,頁2060—2061。

蓋嘗與獨漉、翁山論詩，謂吾粵人人自成面目，不在天下風氣之內……譬之黃金入火，白玉錯刀，雖則光怪百出，要皆有大筆大墨行於其間。非同摭摭幽僻，纂雜稗乘，便自以為排異妥貼、新奇可喜也。⁵⁰

互相印證。無論寫詩如何光怪陸離、嗜險追奇，最終要須有“大筆大墨”行於其間，而不是以幽僻、低俗為豪宕妥貼、新奇可喜。可見這“大筆大墨”就指溫柔敦厚，以之範圍詩人之真性情，就不會流於幽僻低俗，進而可以自開面目；佩蘭並視此為粵人詩之特徵，以及粵人詩獨異天下之原因。

綜上所論，佩蘭之自成面目詩論可細分為四說，以自成面目說為總綱，下以殖學務本、天地真聲、大筆大墨三說為主軸，環環相扣。而《東軒詩略序》是佩蘭標舉此詩論之最重要文章，總綱及三條主軸之論述俱在其中，並以陳恭尹及其子陳勵為自成面目之兩個典範。

同時，佩蘭在多篇文章中都對上述《東軒詩略序》所論到的四說加以闡述，且互相呼應，並加以深化。例如《金茆山堂集序》稱粵詩“人各自立”，《蘭湖詩選序》推許皎然詩“能自成一家”等，都是對“自成面目”說這總綱的呼應。

積學（殖學）務本是“自成面目”的首要條件，這在佩蘭其他文章中都有論及，例如《大樗堂初集序》提出“殖學”之說，又主張殖學之法是“學問綜貫，上下古今”；《楊大山文集序》也強調“若夫文人學士，以著述為事，則必其平時學殖”；《南塘漁父詩鈔序》中指出“飽讀古今之書，含英咀華”之後，“發為文章”，便能“有以自見”。這都與《東軒詩略序》一樣，指出殖學之重要性及其與自成面目之密切關係。

殖學之外，佩蘭主張配合真情，使才情結合，方可寫出自成面目之作。這在《東軒詩略序》中提出，並以其他文章加以深化：如《金茆山堂集序》指出缺乏真情而以所積學問徒事雕繪的話，直如泥人木偶。又稱詩人接觸天下間的人、地、事物等，自然興發諸種情感，寫詩時，借此等性情之物自道其情，即能寫出“天地之真聲”；他又強調今古恒久不變者是人的真情，古今好詩的共通點即為

50 梁佩蘭：《東軒詩略序》，載同上注，頁2078—2079。

“情真”。在情真的基礎上，佩蘭於《南塘漁父詩鈔序》提出詩如其人、人品與詩品統一之要求；《與謝霜崖書》又謂文品、詩品與人品能統一，即可自成面目。他的《大樗堂初集序》又以為，真情要在詩歌中表達得好，還要極其思，提煉情思，力臻“無色之色”“無味之味”“無聲之聲”的自然化境。約言之，要詩作自成面目，首先要累積學問，以學問承托情思，繼而極情思想象之能，入於化境，達至才情結合的最佳境地。凡此，都是對《東軒詩略序》真情說及才情結合說之深入推進。

《東軒詩略序》“大筆大墨”說是佩蘭對詩歌內容及文字上提出的溫柔敦厚要求。他在其他文章中對此有深入闡論：如在《書超玉軒詩集後》將溫柔敦厚的內涵分為兩部分：詩人性情（思想感情）重溫和，立言之旨（詩歌的立意）重寬厚。同時，在《大樗堂初集序》中，他以孔子“思無邪”之說為“溫柔敦厚”的最高原則，在此原則下，無論正風正雅或變風變雅之作，都合溫柔敦厚之旨。《書超玉軒詩集後》又以為《詩經》變風變雅之作所以可稱溫柔敦厚，是由於當時詩人所見亂象極多，在千百種亂象中選取一二作諷喻，其立意已相當寬厚。溫柔敦厚亦是佩蘭天地真聲說中詩人提煉情思的前提，其《中洲草堂遺集序》指出詩人性情表達的終極要求就是此四字，粵人詩能自成面目的其中一個原因亦在於此。無論寫詩時如何虛實並用，詩風如何多變，終歸仍須大筆大墨，溫厚和平。

若從時序先後的眼光看，則佩蘭“自成面目”詩論的發展經過了頗為漫長的歷程：此詩論雖然在其康熙三十八年所寫的《東軒詩略序》才完整提出，展現出週密的理論體系。但其發展歷程卻早在康熙十二年的《大樗堂初集序》開始，該文提出“殖學”說，並主張極其思以臻真情之化境，又指出“思無邪”為“溫柔敦厚”之最高準則；故此文實質上已包括“自成面目”詩論的兩條主軸。據佩蘭《東軒詩略序》回憶，又可推知，至康熙二十年冬陳、屈二家為佩蘭詩集寫序時或之前，他便與二家討論過“自成面目”之論。到康熙三十一年所寫《楊大山文集序》，佩蘭再次重申其殖學要求；同年所寫《中洲草堂遺集序》已提及寫詩求真，又指羅賓王、鄭露、陳子升等粵人詩能開一代風氣之先，並謂溫柔敦厚是詩人性情表達之終極準則，此文已涵蓋天地真聲、自成面目、大筆大墨三方面

議題。其後康熙三十二年，佩蘭在《金茆山堂集序》指出當時海內之詩都競尚擬古，獨粵詩“人各自立”，正式提出自成面目之說；又力主綜貫歷代，方能為詩，重提殖學之說；且稱自道接觸萬事萬物而生之情，即能寫出“天地之真聲”。則此文實已道明“自成面目”詩論之總綱及殖學、求真兩條主軸。到了康熙三十三年秋，佩蘭《蘭湖詩選序》推揚皎然詩“能自成一家”，並以此作為判定詩歌高下之標準，明顯在重述“自成面目”之論。降至康熙三十八年就在《東軒詩略序》中正式提出以“自成面目”為總綱，以積學務本、抒寫真情、大筆大墨三主軸為條件之完整詩論體系。

總之，自詩論內容觀之，佩蘭“自成面目”詩論力主寫詩應殖學以務本。進而自道性情，寫天地真聲，人品與詩品須一致。才情兼備後，乃極其思以求自然化境，使殖學與情真完美合一。最後以“大筆大墨”（溫柔敦厚之旨）行於字句之間，使詩歌內容免於幽僻低俗。殖學務本、天地真聲、大筆大墨三說是“自成面目”詩論之重要支柱，形成佩蘭緊密互扣之創意詩觀；他並視此為粵人詩之特徵，以及粵人詩獨異天下之原因。而自詩論發展歷程觀之，則佩蘭“自成面目”詩論體系由康熙十二年之《大樗堂初集序》始，經歷二十七年之醞釀發展，才在《東軒詩略序》中完備提出。但若單論“自成面目”之總綱，則早在康熙二十年（時佩蘭五十三歲）已與屈、陳二家共同探論，而至康熙三十二年正式提出，並在二十七年間不斷重申。“自成面目”詩論可以說是佩蘭一生最重要之詩論體系，至少代表他由五十三歲至晚年之詩論主張。

三、自成面目詩論之價值

（一）針對擬古之弊

佩蘭《東軒詩略序》還有以下這段文字：“近世之為詩，吾惑焉：奉一人之論，習成風氣，而不覺其偏。如欲某代詩，則群相與嘆之，捨是弗顧也；欲某人詩，又群相與赴之，非是毋取也。”⁵¹ 這是佩蘭提出上節所及“殖學務本說”後，

51 同上注，頁 2078。

進而對明代前後七子復古主張作出的批評。“奉一人之論，習成風氣”二句是針對復古派中人對該派領袖論見之步趨，舉例而言，後七子代表李攀龍就曾對李夢陽甚為推崇。據《明史·文苑傳》：“……攀龍遂為之魁，其持論謂文自西京、詩自天寶而下，俱無足觀，於本朝獨推李夢陽。”⁵²李攀龍獨重李夢陽，在佩蘭看來就屬於過偏一類。

佩蘭“如欲某代詩、則群相與嘆之，捨是弗顧也”三句乃批評前後七子“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非是者弗道”⁵³的理論趨向。其實佩蘭早在《中洲草堂遺集序》就說過“風雅之道，至今日發明無遺蘊矣。返觀明代前輩，優孟漢唐之衣冠，而性情不屬”的話，⁵⁴其“明代前輩”“優孟漢唐之衣冠”之語就是對復古派“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之批評，故《東軒詩略序》這三句只是佩蘭對此種論點的重申。

“欲某人詩，又群相與赴之，非是毋取也”一句則針對前後七子專學漢唐某家之主張，例如何景明就曾說過：“蓋詩雖盛稱於唐，其好古者，自陳子昂後，莫若李、杜二家……故景明學歌行、近體，有取於二家，旁及唐初、盛唐諸人，而古作必從漢魏求之。”⁵⁵標明自己之具體師法對象，也就是佩蘭所言之“欲某人詩”。

配合佩蘭講求殖學、重真的詩觀，他之所以批評復古派“奉一人之論”是“偏”、“欲學某代詩”是“捨是弗顧”、“欲學某人詩”是“非是毋取”，乃因為在他看來，這都是未能窮詩道之源，不能綜貫上下古今學問，未能做到積學以務本，只是受一人之論、一代或一人之詩的影響，涉獵不廣。而且擬古是摹擬古代一人或一代之作品而未必真有其情，故又有欠缺真情之弊，即《中洲草堂遺集序》所指“優孟漢唐之衣冠，而性情不屬”的問題，這都屬於“捨是弗顧”（例如不顧及寫詩須吟詠真情）的情況。

52 張廷玉等撰，潘禔章考異：《明史·文苑傳·李攀龍》，卷285，冊4，頁3161。收入《二十五史（斷句本）·明史》（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5年），總第46—50冊。

53 張廷玉等撰，潘禔章考異：《明史·文苑傳·李夢陽》，同上注，頁3129。

54 梁佩蘭：《中洲草堂遺集序》，載氏著，筆者校注：《梁佩蘭集校注》，冊6，頁2060—2061。

55 何景明撰：《海叟集序》，見氏著《大復集》卷34，《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冊1267，頁302。

(二) 力避淺率俚俗

佩蘭《東軒詩略序》論到“大筆大墨”之說時，曾云：“……譬之黃金入火，白玉錯刀，雖則光怪百出，要皆有大筆大墨行於其間。非同捫掖幽僻，纂雜稗乘，便自以為排募妥貼、新奇可喜也。”⁵⁶其中“纂雜稗乘”是針對當時淺俗的詩風。舉例而言，當時公安派推重小說，又“工諧謔”，⁵⁷使其詩招致俚俗率滑之譏，同屬公安派的袁中道（1570—1624）亦批評己派之弊，其《阮集之詩序》：“及其後也，學之者稍入俚易，境無不收，情無不寫，未免衝口而發，不復檢括，而詩道又將病矣。”⁵⁸“稍入俚易”“境無不收，情無不寫”“衝口而發”等，可算此派過重獨抒性靈，不避俚俗之結果，其中當包含受到小說等通俗文字的影響。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中對此派批評更烈：“王、李之雲霧一掃，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淪心靈，搜剔慧性，以蕩滌摹擬塗澤之病，其功偉矣。機鋒側出，矯枉過正，於是狂瞽交扇，鄙俚公行，雅故滅裂，風華掃地。”⁵⁹錢氏雖然認同以袁宏道（1568—1610）為首的公安派有糾正復古派摹擬之弊的功勞，但公安派卻也矯枉過正，使“狂瞽交扇，鄙俚公行，雅故滅裂，風華掃地”，評價相當負面。佩蘭提出“大筆大墨”，主張溫柔敦厚，正是針對當時詩壇淺率之病而發。在他看來，不能殖學，學問不深，自然容易趨向“纂雜稗乘”，且自以為“新奇可喜”了。由此可知，佩蘭之大筆大墨、殖學務本之說客觀上正可去除“淺率俚俗”之弊。

(三) 抨擊幽深僻冷

上文已言及，佩蘭《東軒詩略序》中“捫掖幽僻”是對當時幽深僻冷一路詩風之批評。在當時詩派中，竟陵派所主之“深幽孤峭”，倡求“孤懷”“孤詣”“孤

56 梁佩蘭：《東軒詩略序》，載氏著，筆者校注：《梁佩蘭集校注》，冊6，頁2078—2079。

57 袁宏道《聽朱生說水滸傳》嘗云：“少年工諧謔，頗溺滑稽傳。後來讀水滸，文字益奇變。”載氏撰，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冊上，頁418。

58 袁中道：《阮集之詩序》，載氏撰，錢伯誠點校：《珂雪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462。

59 錢謙益：《袁稽勳宏道》，載氏撰：《列朝詩集小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冊下，頁567。

行”之旨,使詩句孤僻難解,就有這種傾向。錢謙益(1582—1664)即對其批評甚烈:

當其創獲之初,亦嘗覃思苦心,尋味古人之微言奧旨,少有一知半見,掠影希光,以求絕出於時俗。久之,見日益僻,膽日益粗,舉古人之高文大篇鋪陳排比者,以為繁蕪熟爛,胥欲掃而刊之,而惟其僻見之是師。其所謂深幽孤峭者,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獨君之冥語,如夢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國,浸淫三十餘年,風移俗易,滔滔不返。⁶⁰

錢氏指出鍾惺(1574—1624)創派之初,頗注重尋古人微言奧義,以期迴絕時俗。但日久即生弊,且自視過高;並稱其“惟其僻見之是師”“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獨君之冥語”,如夢入鼠穴、幻入鬼國,這些批評都十分嚴厲,其針對者就是竟陵派幽僻的一面,而稱其“浸淫三十年,風移俗易,滔滔不返”,亦見鍾惺為首的竟陵派負面影響之大。竟陵派此種幽僻詩風之弊,當屬於佩蘭所抨擊的“拮據幽僻”一類。

幽深僻冷詩風之形成本也緣於創作求新的意圖,這是所有為詩者之共同理想,佩蘭也講求“造徑之創,特闢鴻濛”的創新路向。但如其《東軒詩略序》所言,他設置了“煉句之巧,幾經淘汰”的鍛煉詩句要求,並以“大筆大墨”的溫厚和平內容範圍之,故即使“光怪百出”,也不會走向幽僻之境;亦無淺率之病。佩蘭對溫厚和平詩歌內容之看重,就是他批評幽深僻冷詩風的原因,同時此要求客觀上亦糾正了當時竟陵等派深幽孤峭之失。

(四) 嘗試調和明末清初各派而超脫唐宋之爭的藩籬

筆者曾在《葉燮與嶺南三家詩論比較研究》一書中析論過明末清初各派之詩論主張,茲據之概述如下,再作討論:

就明代詩論主張而言,諸派以宗唐宗宋為爭論核心。前後七子等復古派與公安、竟陵、唐宋派形成對抗局面。公安、竟陵反對七子派之復古,力主求新,

60 錢謙益:《鍾提學惺》,同上注,頁 571。

俱講求真，本來頗可衝破唐宋樊籬，但前者有淺率無根之病，後者有獨尋僻徑之弊，招致真、新而無本之譏。陳子龍接武七子派的法古，兼合公安、竟陵之求真，提出“情以獨至為真”之自然抒寫真情見解，尋求詩作中表達“忠愛之至”之儒家內容，但他批評宋詩“俚穢”、背離大雅，以為“終宋之世無詩”，故終亦未能跨越宗唐宗宋的囿限。同時的嶺南詩人陳獻章能獨樹一幟，不受北方詩論影響，其提倡自然之宗、講求題材多樣化，頗與主流詩家相異，惟其過求自然，難免步隨公安派淺率之境。

下迄清初，虞山詩派錢謙益倡言靈心、世運與學問三者結合。提出“學殖以深其根”，便可“養氣充志”，將忠孝悱惻、溫柔敦厚之教配合靈心、世運發揮出來，達到微乎其微的深厚詩境。他不薄宋、元詩，又倡主學歷代之詩，思想較為進步。然而其主張宗經返古，有復古意味；又頗為推許宋元詩，稱宋詩有「續史」之功，被視為標舉宋元；則實際上仍沒有離開以朝代論升降之路。虞山二馮標舉晚唐、鄙棄宋元，故於虞山派中另立宗派，卻再次陷入宗唐宗宋之局中。顧炎武以為每個朝代詩文必然以代變、亦不得不變，此乃“勢”的影響，後人模仿前代，學得不似則算不上是詩，學得似則失卻自我；故排斥摹擬。又抨擊投身異朝卻發忠厚之情於詩文中的前朝士人是“以文辭欺人者”，力主忠須出於真，要“鏡情偽，屏盜言”以恢復君子之道。其說超越同時諸詩評家，但卻並未提出具體解決宗唐宗宋問題之方案；加上其詩論中蘊含一代不如一代之意，經常推尊唐詩，未能擺脫以朝代論詩之思維。吳喬亦貶抑復古派，創作上以比興出意為上，指出詩道離不開“變(變更形式)”“復(恢復內容)”，二者相輔相承，主張形式之推陳出新與內容之發揚傳統，慕求古人之雅；其對變、復問題看得相當通透。惟其以為解決擬古弊病之法乃從唐人命意布局探求，這無疑回到了宗唐之徑；且其著意復古人之傳統內容，故情感詩意也未免因循舊有。朱彝尊主張不應步武復古派之依傍古人、受格律約束，而應發乎心性以為詩，其說甚當。他宗奉杜甫，認為要學杜之“善變(變化內容與技巧)”，並歸於典雅；但卻由此生出輕宋傾向，墮入宗唐宗宋之循環之中。與朱彝尊齊名的王士禛希圖糾正復古派之摹擬、公安派之淺率、竟陵派之幽僻，取唐人之古格、鎔鑄宋人之新意，復以神韻說調和折衷之，思慮周全，用心甚好，與明人陳子龍欲調和各家之想

法殊途同歸。他論詩歷數變，少年宗唐，中年主宋，晚年復歸於唐；其雖力求調和各家，卻欲造唐人之平淡，過於重視“神韻”，最後又回到了重唐之老路。⁶¹

要之，明代及清初諸家各派均聚焦於宗唐宗宋之爭議，新意甚多，但俱不免困縛於此二元對立之中，重變的詩學發展觀以及論詩不拘唐宋的觀點雖偶有提及，如顧炎武謂歷代詩之變為不可阻擋之“勢”，吳喬論“變復”、王士禛欲調和唐宋等，然而最終都未能跳出時代之限制，真正調和各家各派，提出解決復古派摹擬、公安淺率及竟陵幽僻弊病的完備方案。

本文以為，來自嶺南之梁佩蘭之“自成面目”詩論正是此種完備方案之創新性嘗試。當然，在佩蘭之前，也有一些自成面目理論的先聲。例如明人唐順之(1507—1560)曾提出“真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⁶²今人蔡景康(1937—2007)並揭示：“順之至晚年，更強調師法自然和文章貴獨創自得，對後來的公安派有極大的影響。”⁶³而公安派之袁宏道也主張：“大抵物真則貴，真則我面不能同君面，而況古人之面貌乎？”⁶⁴其《敘小修詩》一文推許其弟袁中道之詩云：“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⁶⁵唐、袁之說已屬自成面目之論，並比佩蘭提得更早。然而，唐氏所主的獨創自得仍未超越時代之限。蔡景康嘗將之與前後七子比較：

唐順之論文，與前後七子雖同屬復古，但一主秦、漢，一主唐、宋。他反對前七子祧唐、宋而直入秦、漢，而主張由唐、宋而窺西漢，再由西漢而上窺

61 詳細析論參見拙著：《葉燮與嶺南三家詩論比較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18—68。

62 此見解蒙匿名評審人提示，於此不敢掠美，謹致謝忱。其提示意見原文云：“早在明代中後期，唐順之、袁宏道等已提倡‘真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唐順之此見出自其《答茅鹿門主事書》一文：“今有兩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謂具千古隻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為文章，但直據胸臆，信手寫出，如寫家書，雖或疏鹵，然絕無煙火酸餡習氣，便是宇宙間一樣絕好文字；其一人猶然塵中人也，雖其顯顯學為文章，其於所謂繩墨布置，則盡是矣，然翻來覆去，不過是幾句婆子舌頭語，索其所謂真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絕無有也，則文雖工而不免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文載唐順之：《荊川集》卷4，《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76，頁273。

63 蔡景康編選：《明代文論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頁160。

64 袁宏道：《與丘長孺》，載氏撰，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冊上，頁284。

65 袁宏道：《敘小修詩》，載同上注，頁187。

孔門文學之科，以建立“千古一脈”之文統。……在“法”的問題上，他雖也主張“守繩墨，謹而不肆”，但極力反對前後七子獨守尺寸，而強調“時出新意於繩墨之餘”。⁶⁶

蔡氏強調唐氏雖同屬復古，卻有“時出新意”的一面，比復古派優勝。但我們亦可從中知悉，唐氏以唐、宋文為師法對象，上溯西漢，實質仍未完全擺脫“文必秦漢”的復古派之見。至於公安派，是比較能超越朝代的拘囿，講求自成面貌（“真則我面不能同君面，而況古人之面貌乎”）者，佩蘭詩論中之重真，也與公安派相近。例如袁宏道謂“要以情真而語直。故勞人思婦，有時愈於學士大夫；而呻吟之所得，往往快於平時”，⁶⁷佩蘭亦謂“今民間小人、婦子、閭閻，動息、飲食、言笑，往往天機觸發，不知其所從來。……性情最真，可與見道”，⁶⁸佩蘭此見當受自公安派影響。然公安派理論體系中，卻有俚俗淺率之弊（例如主張以小說等通俗文字入詩），連同屬公安派的袁中道也對此看不過眼，批評其有“稍入俚易”“境無不收，情無不寫”“衝口而發”等病，⁶⁹這使此派之論雖備“自成面目”的先見之明，卻被自身不避俚俗之追求影響其體系之完備，招致錢謙益對其“狂瞽交扇，鄙俚公行，雅故滅裂，風華掃地”之譏。實在來說，公安派此方面之傾向也屬於佩蘭《東軒詩略序》中所批評的“纂雜稗乘”一類的理論。佩蘭可以說是公安派自成面貌理論的修正者。

在上述唐順之、公安派之後，至清初時期，清初的葉燮（1627—1703）也提出自成面目之見，並與梁佩蘭有密切交往。⁷⁰日人青木正兒（1887—1964）在《清代文學評論史》嘗說：

自從錢謙益抨擊格調派的擬古主張，而鼓吹宋元詩以後，打亂了獨尊盛

66 蔡景康編選：《明代文論選》，頁159—160。

67 袁宏道：《陶孝若枕中嚙引》，載氏撰，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冊中，頁1114。

68 梁佩蘭：《離六堂詩序》，載氏著，筆者校注：《梁佩蘭集校注》，冊6，頁2073。

69 袁中道：《阮集之詩序》，載氏撰，錢伯誠點校：《珂雪齋集》，頁462。

70 此見解蒙匿名評審人提示，謹致謝意。而筆者《葉燮與嶺南三家詩論比較研究》一書中對葉燮自成面目之見及其與梁佩蘭之交往論述頗詳，於此一併說明。

唐的統治,有於盛唐之外取中晚唐者,有取宋元者,又有折衷唐宋者,一時詩壇陷於混亂。在這種混亂之中產生了一種傾向,這就是自成一家的思潮。就是說,希望發揮各自個性的思想蓬勃興起;邇本追源,這可以從明萬曆年間公安三袁反抗王、李擬古派而提倡性靈說求得其端緒。至康熙中葉……主張不將目標特別拘泥於唐或宋或元,一切按照個人所好,形成各自風格,以吟詠個人性情為宜的人逐漸出現。首先發出這一呼聲的,是蘇州的葉燮。⁷¹

推許葉氏是清代第一個主張論詩不拘唐、宋、元,要自開面目、自成一家,並以吟詠性情為主的詩家。但此說可以商榷,葉燮之自成面目說主要見於其《原詩》一書,⁷²但此書刻成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或之後,⁷³而如前文所及,佩蘭在康熙二十年(1681)已刻成《六瑩堂集》(初集)並帶往北京,其卷首即載有陳恭尹及屈大均兩篇同時發表“自成面目”說之序,以及從《東軒詩略序》中記述其曾與陳、屈二家討論此說之情況可知,此說應該早在康熙二十年或之前已是三家之共識。故發表此“自成面目”詩論,嶺南三大家要比葉燮早五年。此外,葉燮在後世文學批評史中,往往被認為是宗唐兼宋,如其弟子沈德潛(1673—1769)稱其“論詩以少陵、昌黎、眉山為宗,成《原詩》內、外篇,掃除陳見俗諦”,⁷⁴指出其宗唐之杜甫、韓愈,及宋之蘇軾;這由葉氏的弟子所說,最具說服力。而稱葉氏

71 青木正兒著,楊鐵嬰譯:《清代文學評論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頁89。

72 例如葉燮:《原詩·內篇下》云:“夫作詩者,要見古人之自命處、著眼處、作意處、命辭處、出手處,無一可苟,而痛去其自己本來面目。如醫者之治結疾,先盡蕩其宿垢,以理其清虛,而徐以古人之學識神理充之。久之,又能去古人之面目,然後匠心而出,我未嘗摹擬古人,而古人且為我役。”載葉燮撰,霍松林校注:《原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頁18。

73 據林雲銘為《原詩》寫的序言云:“歲丙寅(康熙二十五年,1686)九月,(葉燮)招余至其草堂,出《原詩》而見示,促膝諷誦竟日。”則知此書刻成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或之後。見林雲銘:《原詩敘》,載同上注,《附錄》,頁84。

74 沈德潛:《葉先生傳》,載氏著:《歸愚文鈔》,《沈歸愚詩文全集》(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清乾隆教忠堂刊本,香港科技大學影印本),卷16。又見呂智敏:《詩源·詩美·詩法探幽:〈原詩〉評釋》(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年),《附錄》,頁194—195。

宗唐的更多，如《清史列傳》云：“變言詩以杜甫、韓愈爲宗，陳見俗障，掃而空之。”⁷⁵譚獻（1832—1901）《復堂日記》亦云：“閱葉已畦《原詩》內外篇，以杜爲歸，以情境理爲宗旨……”⁷⁶近人鄧之誠在《清詩紀事初編》說得更清楚：“《原詩》四卷，專爲尊唐，力闢時人徒襲范、陸皮毛之非，謂詩當以生、新、深爲主。于舉世尊宋之時，獨持己見，發聾振聵，信豪傑之士。”⁷⁷推揚葉氏是在尊宋之世獨持尊唐之說的“豪傑之士”。可見，葉氏雖主自成面目，但其論詩仍頗爲推崇唐代，未脫離朝代之限。儘管如此，葉燮自成面目理論價值仍值得肯定，如爲《原詩》寫跋的沈懋德就云：“國初諸老，尚多沿襲。獨橫山起而力破之，作《原詩》內外篇，盡掃古今盛衰正變之膚說，而極論不可明言之理與不可明言之情與事，必欲自具胸襟，不徒求諸詩之中而止。”⁷⁸以透徹眼光廓清文學之盛衰正變，標舉理、事、情之創新價值，以“自具胸襟”爲文學之終極追求，正是葉氏理論之價值所在。

梁佩蘭在唐順之、袁宏道等前輩之後，也倡議“自成面目”之詩論追求，他與葉燮可以說都受過公安派的影響。⁷⁹然而佩蘭之論，卻能比較著眼於擺脫宗唐宗宋的藩籬，不爲朝代所限，提倡學詩須歷代兼通。前文所引他的《金荊山堂集序》就說：“或謂：詩論時代，自《三百篇》，迨漢、魏、唐、宋、元、明，以至今日，氣運升降，體格因之；不綜貫，無以爲詩。其論是也。不得其真而徒事雕繪，猶之乎狐貉其外，而敗絮其內耳。”⁸⁰證明佩蘭主張學詩須總括貫通歷代，其謂歷代詩“氣運升降，體格因之”，即每個朝代之詩都因氣運而致體裁格調各有不同，其中並無某代較勝某代較劣之說，可見他並不以朝代爲升降。佩蘭接著指出求“真”之重要性，認爲“不得其真”而只求雕繪，即使如何似歷代之詩亦不過

75 王鍾翰校點：《清史列傳》，冊 18，卷 70，頁 5732。

76 譚獻《復堂日記》中語，見錢仲聯：《清詩紀事》（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 年），冊 5，《康熙朝卷》，頁 2606。

77 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冊上，頁 380。

78 沈懋德：《原詩跋》，載葉燮撰，霍松林校注：《原詩》，《附錄》，頁 86。

79 佩蘭受公安派之影響，已述於本部分前文中。而葉燮受公安派影響可參霍松林之說：“《原詩》儘管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它對許多問題的闡述都超越前人，是在復古與反復古的長期鬥爭中吸取和改造了前人的、特別是公安派的某些進步理論而加以發展的有較高成就的詩論專著。”見同上注，《前言》，頁 12—13。

80 梁佩蘭：《金荊山堂集序》，載氏著，筆者校注：《梁佩蘭集校注》，冊 6，頁 2064。

敗絮其中。自前文所論可知，佩蘭又追求人品與詩品之一致，認為“吾之喜怒哀樂，或則言笑，或則歌舞，或則感慨，或則幽咽，一一見於諷詠之間”皆是“天地之真聲”，視野寬闊。上面引文中又提到“綜貫”歷代詩，這也是前文殖學說之又一重申，此說與錢謙益“學殖以深其根”之見近，可說是對錢氏之繼承。

陳子龍和王士禛都有調和諸家之用心，前者以復古派之法古，合公安、竟陵之求真，倡主“情以獨至為真”之自然抒寫真情，堅持詩中須承載儒家忠愛之道。但他排拒宋詩，斥其“俚穢”、稱“終宋之世無詩”，故其初心雖欲兼採上述三派之長而去其短，卻過於輕視宋詩。王士禛也欲矯復古、公安、竟陵三派之弊，取唐人古格、採宋人之新意，並以神韻說調和折衷之，但其為詩先宗唐、後宗宋，晚年欲造唐人之平淡，依然囿於時代之見。至於其餘明代及清初諸家，俱有不同程度之宗唐宗宋傾向，可以說這是當時詩論之主要特徵和限制。

佩蘭繼承唐順之“真精神”、公安派“真則我面不能同君面”的觀點，追尋“天地之真聲”，講求人品與詩品統一；並承傳錢謙益“學殖以深其根”之見；又抱持與陳子龍和王士禛般調和復古、公安、竟陵等諸派之用心；並試圖提出解決宗唐宗宋困局的方案。他以殖學務本為首要創作條件，以吟詠性情、天地真聲作配合，期求殖學與情真合一，強調極其思以造自然化境；復以“大筆大墨”之溫柔敦厚準則範圍詩歌內容，環環互扣；其終極目標是“自成面目”。可以說，佩蘭在前輩陳子龍、同輩王士禛提出解救復古摹擬、公安淺俗、竟陵幽僻之際也力圖提出自己之方案。他力主綜貫歷代，融合明代與清初諸家諸派之長，既不偏唐，亦不拘宋，試圖脫卻“宗唐宗宋”之困局，是具備突破及創新性之努力嘗試。佩蘭並以“自成面目”為粵人詩歌成就之特徵，以及粵人詩獨異天下之理論依據。凡此俱是其詩論之創新及價值所在。

四、佩蘭自成面目詩論與嶺南地理位置及文化傳統之關係

(一) 嶺南位處中原甌脫之地理位置

嶺南文化素有創新及追求自成面目的傳統，這與嶺南之地理位置不無關

係。莊祖緣、方志欽之《簡明廣東史》云：

廣東位於中國的最南部，北依逶迤的南嶺，南臨浩瀚的南海，南嶺（又稱五嶺）是廣東最主要的山脈，橫亘在粵北和湖南，江西兩省之間以及廣西的東北部。位於粵、湘交界的石坑崆山，海拔1902米，成為廣東的最高峰。由於五嶺萬山重疊，在地面上把廣東、廣西和中原分隔開來，所以在中國歷史上，兩廣又稱為嶺南、嶺表、嶺外。古代的陸路交通很不發達，崇山峻嶺是一重天然的屏障和界限，影響了廣東社會經濟的發展，直到唐代，嶺南還被看作化外之地，或者叫做瘴癘之鄉。⁸¹

可知嶺南的地理位置背山面海，其北面的五嶺（即大庾嶺、越城嶺、騎田嶺、萌渚嶺、都龐嶺）是嶺南最主要的山脈，萬山重疊，足以在地面上把嶺南與中原之交通阻隔開。莊、方二氏認為，亦由於此阻隔，嶺南自古以來至唐代，往往被視為化外之地。其實不止唐代，直至清中晚期以前，嶺南還是與中原極為阻隔，黃尊生《嶺南民族與嶺南文化》就說：

百年以前，廣東尚屬一幅邊徼之地，很微弱地接觸到一些中原的文化，雖然文化落後，然人民生活簡樸，古風尚存，同時因其沾染中原人士之氣習不深，故嶺南士夫，得免於中原人士浮靡之氣（袁子才來廣東，黎二樵聲其罪而攻之）。近百年來，海禁大開，因海運與通商關係，廣東驟然臻於繁榮。⁸²

黃尊生此書出版於一九四一年，他所說的“百年以前”相當於道光二十一年（1841）左右，而道光二十年（1840）至二十二年（1842）期間就發生了第一次鴉片戰爭，海禁亦由此大開。黃氏認為，在此以前，嶺南仍是與中原甚為阻隔的。

81 莊祖緣、方志欽主編：《簡明廣東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6。

82 黃尊生：《嶺南民族與嶺南文化》（曲江：民族文化出版社，1941年），頁55。

然而,亦因此使嶺南人沾染中原之習氣未深,生活簡樸,古風尚存。嶺南三大家之一的陳恭尹亦持嶺南人因地理位置關係,性格風尚與中原不同的觀點,其《〈嶺南五朝詩選〉序》云:

五嶺之南,山川盤鬱,別為結構,廣州其都會也。西江發源滇桂,道牂牁數千里,與東、北二江彙而南入於海,於地理家為南龍之外支,不與中土山川同其流峙,故其人大抵尚閒逸而薄聲利,每於天下所趨者,必居人後,而所自守者,亦往往執而不移,地氣使然也。⁸³

恭尹指出在地理上,嶺南山川不與中原山川共流峙,所以嶺南人對天下之趨尚往往居於中原人之後;而嶺南人所自守之價值觀,又能執而不遷。恭尹認為這是嶺南土地山川所賦的靈氣造成。

由上看來,由於嶺南的背山面海,與中原阻隔的地理位置,使嶺南人形成與中原人相異之生活習慣和文化風俗。而此相異體現在詩歌中,亦使嶺南詩人形成異於中原的詩風:

王士禛《池北偶談·粵詩》云:“東粵人才最盛,正以僻在嶺海,不為中原江左習氣熏染,故尚存古風耳。”⁸⁴這是號稱“一代正宗”的清初詩壇巨擘的評論,十分具有代表性。《粵東詩海》的編者溫汝能(1748—1811)亦云:

粵東居嶺海之間,會日月之交,陽氣之所極,陽則剛而極必發,故民生其間者,類皆忠貞而文明,不肯屈辱以阿世,習而成風,故其發於詩歌,往往瓌奇雄偉,較轢今古,以開闢成一家言。其次者亦溫厚和平,兢兢先正典型,不為淫邪佻蕩之音,以與世推移。是則廣東之風也。⁸⁵

83 陳恭尹:《〈嶺南五朝詩選〉序》,收入氏著,郭培忠校點:《獨鹿堂集》,《補遺》,頁 891—892。

84 王士禛撰,勒斯仁點校:《池北偶談》(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冊上,卷 11,頁 251。

85 溫汝能:《〈粵東詩海〉序》,載氏纂輯,呂永光等整理,李曲齋、陳永正審定:《粵東詩海》(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9年),冊上,頁 15。

温氏直接指出嶺南人居嶺海，受日月之間靈氣和陽剛之氣的滋養，因此都忠貞而文明，不肯屈己以阿世，並習成風尚。此種風尚發為詩歌，便形成瓌奇雄偉，卓立今古之詩風，詩作能自成一家。他又謂嶺南詩中，即使次要一等者亦温厚和平，以嶺南先賢為尚，不為當世淫邪佻蕩之詩，並稱以上二者都是嶺南詩風。

温氏上面“粵東居嶺海之間……以開闢成一家言”之說法其實是承繼梁佩蘭《金茆山堂集序》之說法，該序云：“今海內之詩，競趨習尚。予粵處中原甌脫，人各自立，抒其性情，翁山、元孝而外，山帶其一也。”⁸⁶足見在佩蘭心目中，嶺南地理位置是影響嶺南詩能自成面目的關鍵因素，那麼佩蘭能提出“自成面目”詩論，也當與這個地理因素相關。進一步言之，嶺南地理位置既與中原相異，故詩論主張亦當獨樹一幟，這也可以解釋佩蘭《東軒詩略序》中所言“吾粵人人自成面目，不在天下風氣之內”的提法。⁸⁷

（二）嶺南自成面目之文化傳統

除了嶺南特殊地理之影響外，佩蘭能建立自成面目的詩論體系，還與嶺南固有之文化傳統有關。嶺南文化中，與學術思想密切相關者，至少在以下四方面表現出自成面目的特色：

1. 禪宗

禪宗由六祖惠能(638—713)創立，成為中國佛教重要派別。惠能是唐代新州(今廣東省新興縣)人，其弟子輯其語錄為《六祖壇經》。對於惠能創立禪宗之成就及其影響廣遠之因由，龔伯洪《廣府文化源流》論述得頗為簡要，從中可析出惠能所創禪宗能自立一家、自成面目的原因，以及與佩蘭理論之相通處。龔氏云：“惠能的禪學理論主張頓悟，並非無跡可尋，細尋源頭，其實是遠接道生和僧肇，而受於其師五祖弘忍的。他的理論根據是般若學空宗，特別是《金剛經》、《般若經》、《維摩經》等。”⁸⁸可見惠能之頓悟理論乃遙接東晉、南朝宋時之高僧道生(355—434)，東晉之高僧僧肇(384—414)，五祖弘忍(601—675)；並根據《金剛

⁸⁶ 梁佩蘭：《金茆山堂集序》，載氏著，筆者校注：《梁佩蘭集校注》，冊6，頁2064。

⁸⁷ 梁佩蘭：《東軒詩略序》，載同上注，頁2079。

⁸⁸ 龔伯洪：《廣府文化源流》（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164。

經》、《般若經》、《維摩經》之要義而形成理論。《廣府文化源流》又云：

惠能的禪宗吸納了自在解脫的道家思想；又接受了儒學主觀內省的心性學的影響；也不拋棄天竺佛教的輪回說；強調孝是成佛的根本，勸人改惡從善、多行善事、濟世益人。……惠能開創的一代新禪風，成為影響中國世道人心的一股不可忽視的思潮，還影響到日本和東南亞各國。⁸⁹

則知惠能之禪宗不單吸納道生、僧肇、弘忍等諸高僧，以及《金剛經》等諸佛經學說，還博採道家、儒學、天竺佛教等諸家思想，自成一家；這與佩蘭自成面目說中“從源溯流，先河後海”以及“學問綜貫，上下古今”⁹⁰的積學務本理論正好相通。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云：“禪宗以不著語言、不立文字、直指本心、見性成佛為教義，一變佛教之窠臼。後此宋明間，儒、佛混合，皆自此始。”⁹¹印度原始佛教講求嚴密邏輯，惠能擺脫其影響，創立嶄新之本土佛教禪宗，開啟後來宋明間儒佛混合之學風，影響廣遠。其誕生於廣東，影響全國及東亞等地；並成為嶺南文化自成面目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單如此，禪宗更影響及陳獻章之江門心學。

2. 心學

陳獻章(1428—1500)，字公甫，號實齋，廣東新會人。因居廣東江門白沙里，人稱白沙先生，創立“白沙學派”(又稱“江門學派”)，開創明代“心學”之先河。白沙力主“覺悟”“求諸吾心”，其說實來自惠能禪宗思想的影響。與白沙同時之晚學夏尚朴(1466—1538)就指出“白沙之學近禪”，⁹²姜允明《陳白沙其人其學》一書中列出白沙學說的十種來源：

89 同上注，頁 165。

90 梁佩蘭：《東軒詩略序》，載氏著，筆者校注：《梁佩蘭集校注》，冊 6，頁 2078。

91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頁 73。

92 夏尚朴：《夏東巖文集》，載黃宗羲著，沈芝盈點校：《明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修訂本)，卷 4，頁 66。

1. 顏回、曾點所表達的“自然”；
2. 孟子的“勿忘勿助”；
3. 老子的“自然”；
4. 莊子心靈的解脫與“道”的觀念；
5. 陶淵明的田園生活和對自然和詩的愛好；
6. 惠能的“無心”之說與禪學方法；
7. 邵雍的“觀物”學說；
8. 程顥的“自然觀”與“天人合一”思想；
9. 陸象山對心與宇宙關係的理解；
10. 《中庸》的“誠”與“和諧”觀。白沙綜合各家學說，開出“心”的創造觀。⁹³

其中第六種來源就是“惠能的‘無心’之說與禪學方法”，認為白沙是“綜合各家學說”，形成江門心學。依此揆量，白沙集各家之長而成自家之說，亦類近惠能創立禪宗時綜貫古今衆說再形成己說之進路，也是佩蘭自成面目說中“學問綜貫，上下古今”的積學務本行徑。

白沙學說之本質是儒學，與禪宗實異，但其又有取法禪宗之處，並形成自成面目的宗派。羅香林在《中原文化的南下與廣東學術思想的發展》一文評價陳白沙云：“中國理學，到了白沙，然後達到了精的境界，而其期於應用不遺，與立名節為道的藩籬，尤為嶺學以讀書修身發揮學問全體大用的精神所在。”⁹⁴認為白沙學說在中國理學史上是精微境界之代表，地位超然；並稱其學說中重視應用，並以名譽和節操作為道義屏障等追求，是嶺南學術精神之要義所在。現代新儒家代表之一的熊十力更直接道出白沙學說具備一種獨立精神：

獨立者，無所依賴之謂也。明儒陳白沙先生曰：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唯自信者，能虛懷以求真理。一切皆順真理而行，發揮自家力量，大雄，太無畏，絕無依傍，絕無瞻徇，絕無退墜，堂堂巍巍，壁立萬仞，是謂大丈夫，是謂獨立。⁹⁵

⁹³ 姜允明：《陳白沙其人其學》（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年），頁179。

⁹⁴ 羅香林：《中原文化的南下與廣東學術思想的發展》，《中國文化論叢：乙堂文外》（香港：中國學社，1967年），頁58。

⁹⁵ 熊十力：《十力語要》，載蕭蓬父主編，郭齊勇副主編，郭齊勇、景海峰、王守常等整理：《熊十力全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卷4，頁366—367。

這種“發揮自家力量”“絕無依傍”的“獨立”精神，可以說是白沙學說“自得”之學的最高精神，也可以說學問能自成面目的關鍵。若我們將佩蘭《金茆山堂集序》所云“今海內之詩，競趨習尚。予粵處中原甌脫，人各自立，抒其性情……”之說，⁹⁶與之相對照，就會發現佩蘭所主張“人各自立”的“自成面目”之說，正與白學之“獨立”精神相通，亦可以說是此種精神之承繼。

陳白沙又好以心學論詩，在當時影響甚大，其《認真子詩集序》曰：

……自唐以下，幾千年於茲，唐莫若李、杜，宋莫若黃、陳，其餘作者固多，率不是過。烏乎！工則工矣，其皆《三百篇》之遺意歟？率吾情盎然出之不以贊毀歟？發乎天和不求合於世歟？明三綱，達五常，徵存亡，辯得失，不為河汾子所痛者，殆希矣。⁹⁷

白沙認為李白、杜甫、黃庭堅、陳師道固然是詩壇大家，其作甚工巧，但也有不足之處，不盡符《詩經》的遺意。他指出，要達此遺意，須在抒情時抒寫自然情感而不肆加褒貶，由乎天然之志而不期與俗世相合；在題材內容上，所為詩須符合三綱五常、辨別存亡得失的儒家精神，也就是詩歌要承載儒道。佩蘭之“大筆大墨”說，重視詩歌內容須符合溫厚和平，其見解正與白沙相合。白沙曰：“詩之工，詩之衰也，率吾情盎然出之。”⁹⁸這是力主抒寫自然而出之真情。佩蘭自道其情的“天地真聲”說，亦正與白沙此著重抒發真情之說相合。佩蘭詩作就有“自是白沙風教遠”之句，⁹⁹則佩蘭熟諳白沙之說可以想見，受其影響也很自然。何況上述溫柔敦厚、天地真聲二說正是佩蘭“自成面目”說其中兩條主軸，佩蘭受白沙學說自成面目精神影響也在情理之內。

3. 《易》學

嶺南之《易》學研究，自明代始興盛：陳白沙的弟子湛若水（1466—1560）

⁹⁶ 梁佩蘭：《金茆山堂集序》，載氏著，筆者校注：《梁佩蘭集校注》，冊6，頁2064。

⁹⁷ 陳獻章：《認真子詩集序》，見氏原著，孫通海點校：《陳獻章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冊上，頁5。

⁹⁸ 同上注。

⁹⁹ 梁佩蘭：《贈人》，載氏著，筆者校注：《梁佩蘭集校注》，冊5，頁1776。

便是《易》學大師，湛氏是廣東增城甘泉都（今廣州市增城區新塘）人，明弘治十八年（1505）進士，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吏部尚書、兵部尚書。他同時是理學家，世稱“甘泉先生”，《易》學著作有《修復古易經傳訓測》十卷，今已不傳，只傳序言。王漸達（1498—1559），廣東番禺人，曾師從湛若水，明正德十二年（1517）進士，官至刑部主事。著有《讀易記》三卷。黎遂球（1602—1646），廣東番禺人，明天啟七年（1627）舉人。清軍南下，任南明兵部職方司主事，守贛州。城破被害，獲贈兵部尚書。著有《周易爻物當名》二卷及《易史》（今不傳）。

其中影響較大的是陳邦彥（1603—1647），廣東順德人，為陳恭尹父親，南明隆武元年舉人，廣東三忠之一，永曆帝於其死後詔贈兵部尚書。著有《易疏》十二卷，但在陳恭尹整理其遺稿時已只存一卷，及至溫汝能（1748—1811）重刻邦彥詩文集時已全部失傳。¹⁰⁰

邦彥《易疏》雖然現在已失傳，但他傳授給很多弟子，在當時及後世影響甚大。其門人薛始亨《贈兵部尚書陳巖野先生傳》稱邦彥“治《易》、《詩》，教授嘗數百人，後先出其門者數千人”，¹⁰¹足見邦彥《易》學傳授影響之大。薛氏亦自云：“予嘗從受《周易》、《毛詩》，自己卯迄乙酉，皆及門也。”¹⁰²己卯（1639）至乙酉（1645）共歷七年，也就是薛氏從邦彥學《易》達七年之久。邦彥亦是嶺南三大家之一屈大均的業師，大均曾言：“余十六從公受《周易》、《毛詩》，公數賞余文，謂為可教。”¹⁰³可知大均受其業師影響甚深，大均著有《翁山易外》七十一卷，被稱為“精深之學”，¹⁰⁴何淑蘋《屈大均〈翁山易外〉研究》一書指出其價值云：

屈氏在前人《易》學的基礎上，運用了象數、義理兩種不同的解經途徑，形成其兼說象、數、理的治《易》特點。而其篤信圖書，不合於清初辨偽

100 詳情見溫汝能：《重刻〈陳巖野先生集〉跋》，載陳邦彥著，王傳龍校注：《陳邦彥詩文集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頁481—482。

101 薛始亨：《贈兵部尚書陳巖野先生傳》，載同上注，頁426。

102 同上注，頁429。

103 屈大均：《順德給事巖野陳公傳》，歐初、王貴忱主編：《屈大均全集》，冊3，《翁山佚文》，頁447。

104 李稔：《〈翁山文外〉題辭》，同上注，《題辭》，頁3。

潮流,又偏重象數,顯示漢學漸興之趨向,凡此均可結合當時《易》學觀之。故吾人不妨視《翁山易外》為屈氏一家之學,而備清初《易》學史之一說,亦可矣。¹⁰⁵

大均受《易》於邦彥,則邦彥《易疏》應該也具備引文中所述特點,這就是與清初主流相異,而為明末清初嶺南《易》學之一種主流,也可說是其中一種自成面目的傳統。而邦彥《易疏》當是影響大均《易》學能自成面目的啟導之作。

佩蘭亦曾受教於陳邦彥,其《秋夜宿陳元孝獨漉堂讀其先大司馬遺集感賦》云:“私淑欽前哲,貧交得後昆。”¹⁰⁶自稱是邦彥的私淑弟子,又稱與邦彥之子恭尹是貧賤之交,則邦彥之《易》學對佩蘭應有沾溉,至少是邦彥“治《易》、《詩》,教授嘗數百人”¹⁰⁷中之一。大均《六瑩堂詩集序》就指出佩蘭精於《易》學,其詩亦得力於《易》:

吾黨二三子,才之高者,莫若梁藥亭。其詩雄奇光怪,能開鑿自成一川嶽,下筆風馳電激,倏忽千萬里,不見其起滅之跡。人謂其多得於莊周,吾則謂得之於《易》。……不惟以藥亭詩為得於《易》,且謂天下人之詩皆得之於《易》。……吾嘗欲以《易》為詩,使天地萬物皆聽命於吾筆端,神化其情,鬼變其狀……其才化,而學亦與之俱化。斯道也,庶幾惟吾藥亭可與同進乎此。……藥亭故以《易》起家,故為序其《六瑩堂集》,言之若此。¹⁰⁸

此引有三個值得注意之處:其一,大均稱佩蘭詩雄奇光怪,自開面目;又謂其才思敏給,妙於變化,落筆如風馳電掣;大均以爲此等特色皆得力於《易》。其二,

105 何淑蘋:《屈大均〈翁山易外〉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年),頁253。

106 梁佩蘭:《秋夜宿陳元孝獨漉堂讀其先大司馬遺集感賦》,載氏著,筆者校注:《梁佩蘭集校注》,冊2,頁341。

107 薛始亨:《贈兵部尚書陳巖野先生傳》,載陳邦彥著,王傳龍校注:《陳邦彥詩文集校注》,頁426。

108 屈大均:《翁山文外·六瑩堂詩集序》,歐初、王貴忱主編:《屈大均全集》,冊3,頁61。

大均在引文中發表他以《易》為詩的詩論，¹⁰⁹主張天下好詩都是得力於《易》；並謂以《易》為詩所達至之才學俱化的高深境界除了大均自己外，就只有佩蘭可做到。其三，大均指出佩蘭之學問是“以《易》起家”。上面三點非常重要，既道出佩蘭學問以《易》起家，又可由此得知佩蘭《易》學應是接續與大均相近、來自陳邦彥之自成面目的嶺南《易》學傳統。更重要的是，這說明佩蘭詩與《易》學的直接關係，也就是與陳邦彥為首之嶺南《易》學傳統之關係。佩蘭在《大樗堂初集序》曾言：“思之之力可以無所不至……無色之色，無味之味，無聲之聲，此之謂化。王子蒲衣所著詩，神明造姿，孤雋表骨，學問醞釀，能極其思，左右變化以出之。”¹¹⁰這是佩蘭“自成面目”詩論中“天地真聲說”所述的提煉情思方法。上文已及，“思之之力”指情思的想象力，可以想象到天下萬事萬物，其最高境界，能使作品企及“無色之色”“無味之味”“無聲之聲”的自然化境；這是發揮情思想象力到極致而入於化境的表現。“極其思，左右變化以出之”是指發揮最高想象力，將真情提煉到極致，以各種變化多端的面貌呈現在詩中。凡此所述，都與大均對佩蘭“其詩雄奇光怪，能開鑿自成一川嶽，下筆風馳電激，倏忽千萬里，不見其起滅之跡。……神化其情，鬼變其狀……其才化，而學亦與之俱化”之詩藝特徵描述非常吻合。可以說，佩蘭此“極其思”之情思想象力的論述正是受自《易》學的影響，並在他的詩作中發揮出來；換句話說，佩蘭自成面目詩論也受自嶺南《易》學傳統，尤其是陳邦彥和屈大均為代表之自成面目《易》學傳統之影響。

4. 文學

以詩歌為主體之嶺南文學亦有自成面目之傳統，陳永正在《嶺南詩歌研究》一書第二章“嶺南詩派”中曾對漢初至當今之嶺南詩歌作總體論述，認為自唐玄宗初年張九齡（678—740）的出現標誌着嶺南詩歌步入成長期，其中頗可

109 大均“以《易》為詩”之詩論詳參拙著《屈大均詩學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年）中《屈大均的詩學創作觀》一章，頁76—84。又見拙文《屈大均“以《易》為詩”說析論》，載鄭培凱、范家偉主編：《舊學新知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119—156。

110 梁佩蘭：《大樗堂初集序》，載氏著，筆者校注：《梁佩蘭集校注》，冊6，頁2056。

見出嶺南文學自成面目傳統之軌跡，茲概述其自唐代至明代之說，以概其餘。¹¹¹

陳永正指出初唐詩壇尚存“梁、陳宮掖之風”，詩歌風格輕靡，陳子昂倡導漢魏風骨，一改六朝陋習，韶州曲江人張九齡便是同時期主張詩歌革新的同盟者。又稱張氏有“雅正沖澹”和“高古清剛，風骨稜稜”兩種創作路向，認為他“對嶺南詩派的開創、形成和發展壯大，都起著啟迪作用”，且“成為嶺南詩歌的百代宗主”。及至晚唐，則有邵謁與陳陶二家，接續曲江風氣，其中韶州翁源人邵氏以五古見長，形成“洗剝到極淨極真”的藝術風格，其真樸詩風與九齡之雅正，成為嶺南詩派兩種創作主線，影響各代嶺南詩人。下至北宋，嶺南代表詩人有曲江人余靖（1000—1064），余氏為一代名臣，其詩繼承九齡、邵謁而體現“幽峭傲兀、蒼勁樸老的風骨”，並善於託物言志。南宋時人，增城崔與之（1158—1239）及番禺李昂英（1201—1257）較為著名，前者“風格高華壯亮”，“多憂念國事之作”，沉鬱中有高昂之氣。後者之詩“剛直激昂，奇崛遒健”。陳永正認為此兩家詩以凌雲健筆體現嶺南詩歌之“雄直”本色。到了元代，新會羅蒙正乃著名詩人，受到清人顧嗣立及溫汝能之推揚，陳氏指出羅氏在萎靡不振的元代詩壇中，樹立雄闊蒼茫之幟，開後來南園五子之先河。¹¹²

陳氏認為直到元末明初“南園五先生”（即南海孫蕢、番禺黃哲、南海王佐、番禺趙介及番禺李德；又稱“南園前五先生”）出現時，嶺南詩派正式建立，“標誌着嶺南詩歌進入成熟期”。陳氏指出最早標舉“嶺南詩派”的是明人胡應麟，又引朱彝尊之說，認為朱氏把黃佐（香山）和南園後五先生歐大任（順德）、梁有譽（順德）、黎民表（從化）、吳旦（南海）、李時行（番禺）等詩人看作是南園前五先生的繼承者，使“嶺南詩派”之說得以延續。陳氏又謂下迄明代後期，區大相（高明）、鄭露（南海）被王士禛稱為此時嶺南詩派之先驅人物，並認為嶺南三大大家及周圍大批詩人則是士禛心目中之“粵東詩派”。陳氏又謂，嘉慶年間詩人李黼平將嶺南詩派、河朔詩派、江左詩派並稱為全國三大詩派。¹¹³

以上是自唐至明末清初嶺南詩歌發展之概況，從中可見嶺南詩歌歷來都

111 陳永正：《嶺南詩歌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24—41。

112 同上注，頁25—28。

113 同上注，頁29—30。

能獨樹一幟，在全國發揮積極影響。陳永正《嶺南詩派略論》一文論述嶺南詩派特色時，在“富於革新精神”一小節中，更對自唐以來嶺南詩歌之創新成就作一精要概括：

嶺南詩人標舉唐音，但不盲目復古。歷代優秀詩人，每能一空依傍，自立門戶。唐張九齡“首創清淡之派”；宋余靖以其樸老之作，一洗西崑的鉛華；南園五子一反元詩的淺薄靡弱，上追三唐；嶺南三家力掃明代復古之風；清黎簡、宋湘銳意創新，拔戟自成一隊；近代黃遵憲、康有為、梁啟超更成爲“詩界革命”的主要人物，給傳統詩歌增添了生氣和活力。¹¹⁴

他認爲嶺南歷代詩皆富於革新精神，張九齡、余靖、南園五子、嶺南三大家等皆能“一空依傍，自立門戶”，這實質上也正揭示嶺南詩歌素有自成面目的傳統。然而本文以爲，若論正式標舉“自成面目”之詩論，有比較完整之理論體系和論述作支撐，並在多篇文章中發表出來，具備一種“自成面目”之覺醒，則是以梁佩蘭爲最重要代表。

綜合本部分可知，嶺南禪宗、心學、《易》學、文學等範疇都承傳著一種自成面目的文化傳統。而這傳統的形成，往往建立在受前面學說影響而自開面目的進路上，既重視吸納前人，更重視自開面目；即使是不同學說，仍無礙自成面目傳統的接續。例如白沙心學有近禪宗及來自禪宗之處，但其心學卻能自成面目；雖然前者爲儒學，後者是禪學，但並無礙其承傳自成面目之精神。而佩蘭治學爲詩，都曾受到這些傳統的直接或間接影響。佩蘭能建立自成面目的詩論體系，除與嶺南地理有關係之外，還與這些固有文化傳統有關。佩蘭《東軒詩略序》“蓋嘗與獨漉、翁山論詩，謂吾粵人人自成面目，不在天下風氣之內”等之自成面目詩觀，就是上接嶺南禪宗、心學、《易》學、文學這些自成面目文化傳統而形成的。

114 陳永正：《嶺南詩派略論》，《嶺南文史》1999年第3期，頁15。

五、結 語

本文探討佩蘭自成面目之創意詩論及其與嶺南文化傳統之關係，分爲三節析論其理論之內涵、價值，及其與嶺南地理、文化傳統之關係，茲有數點總結：

佩蘭詩學思想發展可分爲前後兩期，以康熙二十年（時佩蘭五十三歲）其刻成《六瑩堂集》（初集）爲分界線：前期是綜貫歷代詩學以求自成面目之階段，體現在詩作中便有兼採漢魏、三唐以至宋詩，甚至吸取《莊子》之名理、《楚辭》之旨趣、《文選》之格局以爲詩的特點，詩風並呈現方中德所指的四變：少年“才思奇特，闢語驚人”，青年“渾含包舉，意概恢宏”，壯年“骨淨神融，體舒氣靜”，晚年則“洗滌烹鍊，廣博澄涵，神骨聲色皆備”，各時期已經各有面目。故屈、陳二家爲其初集寫序時，稱其詩能自成面目。後期大致是五十三歲以後，乃“自成面目”理論之總結階段，發表多篇與“自成面目”詩論相關之文章；其理論反映在詩中已是張尚瑗所稱，完全是“卓然成一家言”的“六瑩堂之詩”。與前期之分別在於其有豐富而自成體系之理論總結，以及更爲從心所欲、成熟發揮的“自成面目”理論與創作實踐相結合的詩歌成就。佩蘭以“自成面目”爲志向，並體現在人生各個階段，這在清初詩壇甚爲少見，並成爲其詩學思想之核心。

佩蘭之自成面目詩論可細分爲四說，以自成面目說爲總綱，下分殖學務本、天地真聲、大筆大墨三說爲主軸，形成緊密互扣之創意詩觀。而佩蘭《東軒詩略序》是標舉此詩論之最重要文章，總綱及三主軸之論述俱在其中；佩蘭在多篇文章中都對《東軒詩略序》所論之四說加以闡述、呼應及深化。具體而言，首先須殖學務本，綜貫歷代詩歌。繼而自道性情，寫天地之真聲；人品與詩品要求一致；才情兼具後，乃極其思以求自然化境。還須表現“大筆大墨”之旨，使詩歌內容避免幽僻低俗。最後形成自我面目。佩蘭並以自成面目爲粵詩的特徵及其獨異天下之原委。

佩蘭“自成面目”詩論之發展歷程早在康熙十二年《大樗堂初集序》所倡議之“殖學”“思無邪”二說開始，蓋此二說即是“自成面目”詩論的兩條主軸。康熙二十年冬，陳、屈二家爲佩蘭詩集寫序時或之前，佩蘭便與二家講論“自成面目”之見。到康熙三十一年《楊大山文集序》重倡“殖學”；同年之《中洲草堂遺

集序》又究論天地真聲、自成面目、大筆大墨三項內容。其後在康熙三十二年之《金茆山堂集序》正式標舉“人各自立”，兼重提殖學、倡求“天地之真聲”，該文實已申明“自成面目”詩論之總綱及殖學、求真兩條主軸。翌年秋天，佩蘭於《蘭湖詩選序》再重申“自成面目”之論。下及康熙三十八年，他即在《東軒詩略序》中完整提出以“自成面目”為總綱，以積學務本、抒寫真情、大筆大墨三主軸為條件之週密詩論體系。其體系由《大樗堂初集序》始，到《東軒詩略序》完備提出，經歷二十七年之醞釀期，是佩蘭一生最重要之詩論體系，代表了他至少由五十三歲至晚年之詩論主張。

佩蘭“自成面目”詩論體系之提出，是有的放矢，針對當時詩壇弊病而發。其中“殖學務本”“天地真聲”乃針對復古主張而提出，以為當時主張摹擬者未能窮究詩道之源、綜貫上下古今學問，卻只受一人之見、一代及一人之詩的影響，涉獵面較窄；而且強調摹擬，有缺乏真情之病；遂以“殖學”“真情”藥之。佩蘭又批評當時詩壇有“捃摭幽僻，纂雜稗乘，便自以為排鼻妥貼、新奇可喜”之風氣，“捃摭幽僻”是謂幽深僻冷一路之詩風，“纂雜稗乘”則指淺率俚俗詩風。當時受到錢謙益抨擊為“惟其僻見之是師……如夢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國”之竟陵派，以及同屬公安派的袁中道疵議為“稍入俚易”“境無不收，情無不寫”“衝口而發”之公安派末流，當分別屬於佩蘭所批評之“捃摭幽僻”及“纂雜稗乘”之類。因而佩蘭提出“大筆大墨”及殖學務本，以溫厚、殖學清除此類淺率俚俗之病；復以“大筆大墨”之溫厚和平內容約制幽深僻冷一類之詩風。

明代以還諸派詩論，以宗唐宗宋為論辯核心，復古與公安、竟陵各派形成對抗之局。陳子龍和王士禛曾嘗試調和各家，提出挽救復古摹擬、公安淺俗、竟陵幽僻之論見，各有特色。出身嶺南的佩蘭也試圖提出自己之解決方案，其倡議綜貫歷代詩，併合明清各家各派之長，不偏唐、不拘宋，力求擺脫“宗唐宗宋”之困局，以“自成面目”為終極；乃具有突破及創新性之努力嘗試。其“自成面目”之說並非首創，乃繼承唐順之“真精神”、公安派“真則我面不能同君面”的論見；並吸採錢謙益“學殖以深其根”之說；參以大筆大墨而形成自成一家的“自成面目”詩論。佩蘭與葉燮曾有密切交遊，都受過公安派的影響，並均有“自成面目”之說。然而，發表此“自成面目”之論，嶺南三大家要比葉燮早五

年。加之葉氏之詩論取徑向被視爲宗唐兼宋，主張其宗唐者甚至更多。佩蘭之見卻與葉氏迥異，比較強調拋脫宗唐宗宋之藩籬，無偏重唐或宋之見，倡求歷代兼通，不爲時代所拘。這使佩蘭之論能較好地吸取公安派重真之說，並以殖學務本、大筆大墨揚棄其淺率俚俗，成爲該派此方面理論之修正者。佩蘭更以“自成面目”爲粵人詩歌成就之特徵，以及粵人詩獨異天下之理論依據。

佩蘭能建立自成面目詩論，與嶺南地理位置及文化傳統甚有關係。基於嶺南背山面海，與中原阻隔的獨特地理位置，使嶺南人在生活習慣和文化風俗上與中原相異。王士禎認爲這是粵詩尚存古風之因。溫汝能也認爲嶺南人居嶺海，受日月間靈氣和陽剛之氣影響，遂有忠貞文明，不肯屈己以阿世的風尚。此風尚表現於詩中，遂有瓌奇雄偉、卓立古今之貌，詩作故能自成一家。溫氏此種說法是發揚梁佩蘭《金茆山堂集序》“今海內之詩，競趨習尚。予粵處中原甌脫，人各自立，抒其性情……”之說。可知地理位置也是影響嶺南詩能自成面目之關鍵，亦是促使佩蘭形成“自成面目”詩論之重要環境，所以他說“吾粵人人自成面目，不在天下風氣之內”。

嶺南禪宗、心學、《易》學、文學等範疇都承傳著自成面目的文化傳統；其形成又建立在吸納前說而自開面目道路之上；即使學說不同，亦無阻自成面目傳統的延續。從影響的軌跡看，惠能禪宗影響陳白沙心學，白沙集各家之長以成自家之說，是近於惠能創立禪宗時綜貫古今衆說而成己說之門徑，亦是佩蘭自成面目詩論中“學問綜貫，上下古今”的積學蹊徑。而佩蘭認爲粵詩“人各自立”的見解，也與白沙心學中“自得”之獨立精神相合。同時，白沙“率吾情盎然出之”之詩論又影響佩蘭天地真聲說。加以嶺南有深厚之《易》學傳統，其中陳邦彥爲首、屈大均繼之的自成面目《易》學傳統，也使佩蘭受到薰染，他那“極其思”以發揮情思想象力之論即來自此傳統的影響。嶺南的文學傳統多重革新、自開面目，但正式揭櫫成詩論，並形成完整體系，在各篇文章中發表，有鮮明之“自成面目”思維覺醒，並視之爲嶺南獨異於中原之詩歌特色，則在嶺南以至清初詩壇皆當以梁佩蘭爲主要代表。

(作者：香港珠海學院中國文學系 教授)

引用書目

一、專書

上海書畫出版社、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室編：《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年。

王士禛撰，勒斯仁點校：《池北偶談》。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王雲五主編，陳鼓應注譯：《老子今注今譯及評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何淑蘋：《屈大均〈翁山易外〉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年。

何景明著：《大復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67。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呂智敏：《詩源·詩美·詩法探幽：〈原詩〉評釋》。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年。

沈德潛：《歸愚文鈔》，《沈歸愚詩文全集》。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清乾隆教忠堂刊本，香港科技大學影印本。

屈大均撰，歐初、王貴忱主編：《屈大均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

青木正兒著，楊鐵嬰譯：《清代文學評論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原版1950年。

姜允明：《陳白沙其人其學》。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年。

唐順之：《荊川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7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袁中道撰，錢伯誠點校：《珂雪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袁宏道撰，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張廷玉等撰，潘耒章考異：《二十五史（斷句本）·明史》。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5年。

梁佩蘭著，董就雄校注：《梁佩蘭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

梁佩蘭撰，呂永光校點補輯：《六瑩堂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2年。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莊祖緣、方志欽主編：《簡明廣東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

- 陳永正：《嶺南詩歌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8年。
- 陳邦彥著，王傳龍校注：《陳邦彥詩文集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
- 陳思編撰，崔爾平校注：《書苑菁華校注》。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年。
- 陳恭尹撰，郭培忠校點：《獨漉堂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年。
- 陳獻章著，孫通海點校：《陳獻章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黃宗羲著，沈芝盈點校：《明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黃尊生：《嶺南民族與嶺南文化》。曲江：民族文化出版社，1941年。
- 楊天宇撰：《禮記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 溫汝能纂輯，呂永光等整理，李曲齋、陳永正審定：《粵東詩海》。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9年。
- 葉燮撰，霍松林校注：《原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
- 董就雄：《屈大均詩學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年。
- 董就雄：《葉燮與嶺南三家詩論比較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 熊十力撰，蕭楚父主編，郭齊勇副主編，郭齊勇、景海峰、王守常等整理：《熊十力全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 蔡景康編選：《明代文論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
- 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 錢仲聯：《清詩紀事》。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
- 錢謙益撰：《列朝詩集小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 龔伯洪：《廣府文化源流》。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二、論文

- 呂永光：《梁佩蘭佚文輯目提要》，《廣東史志》1989年第3期(總第21期)，頁50—53。
- 陳永正：《嶺南詩派略論》，《嶺南文史》1999年第3期，頁13—15。
- 董就雄：《屈大均“以〈易〉爲詩”說析論》，鄭培凱、范家偉主編：《舊學新知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119—156。
- 羅香林：《中原文化的南下與廣東學術思想的發展》，《中國文化論叢：乙堂文外》。香港：中國學社，1967年，頁53—60。

The Value of Liang Peilan’s Poetics of “Self-Fashioned Idiosyncrasy”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Cultural Tradition of Lingnan

Dung Chau Hu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Chu Hai College of Higher Education, Hong Kong)

Abstract

The most prominent feature of the poetics of Liang Peilan (1630 – 1705), one of the “Three Great Masters of Lingnan,” is his innovation in promoting the theory of “self-fashioned idiosyncrasy.” This theory features a self-contained system, which had undergone developments for many years before it became the core of Liang’s poetic thought. Liang’s poetics a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his creative output and reflected in all stages of his artistic life. This was not a common phenomenon in that period.

The theory of “self-fashioned idiosyncrasy” as its general outline consists of three main principles, namely: 1) writing in the true voice of heaven and earth, 2) strengthening one’s learning of the basics, and 3) writing in a carefree manner on significant themes. Liang advocated “self-fashioned idiosyncrasy” as an ultimate goal. First of all, one must tell one’s genuine feelings. One must have innate and acquired talents, the former of which varies from one to another and cannot be acquired through effort; so learning is essential. When one has both talents and feelings, one needs to give full play to imagination and write about the realm of unpredictable changes. Finally, one should write in a carefree manner on significant themes.

This kind of poetics has been directed against the poetic styles of archaism,

mimicking, uncommon diction and vulgarity since the Ming Dynasty. Their foremost emphases include: the expression of genuine feelings, the need to cultivate temperament from knowledge, and the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innate and nurtured talents. Objectively speaking, it would remove the vulgarity and flaws of excessive straightforwardness of the Gong'an School and the uncommon diction of the Jingling School. At the same time it would correct the lack of true feelings in the works of the archaists. Liang Peilan had a noble goal to achieve. He aimed at transcending the demarcation of the worship of Tang and Song poetics in order to reconcile various schools.

Liang's poetics were built on the basis of his predecessors. They include: the "true spirit" advocated by Tang Shunzhi (1507 – 1560), the theory on "distinct idiosyncrasy" by the Gong'an School and Qian Qianyi's (1582 – 1664) insights of "learning to cultivate one's foundation." They also adopt the "self-fashioned idiosyncrasy" and emphasis of the truth advocated by the Gong'an School, while discarding its drawbacks of simplicity and vulgarity. At the same time, they are an extension of the academic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of Lingnan Chan Buddhism, Study of the Heart-mind, scholarship of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literature, laying special emphases on innovation in the literary tradition of Lingnan. Although Liang's poetics were influenced by some predecessors as well as the Lingnan tradition, he formally proposed the theory of "self-fashioned idiosyncrasy," published his views in many articles and consummated a complete form of poetics. He often consciously expressed the ideas of "self-fashioned idiosyncrasy" and regarded them as the unique features of Lingnan poetry, differentiated from the poetry of central China. Therefore, Liang Peilan should be seen as the main representative of this campaign.

Keywords: Liang Peilan, Three Great Masters of Lingnan, "self-fashioned idiosyncrasy", poetics, Cultural Tradition of Lingnan